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看青年 怎样改变 世界

如此不同，却又如此相似
莫妮卡·科尔曼

移动革命
琪琪·易卜拉欣

愤怒的春天
埃尔夫雷多·费尔南德斯

神奇武器
赛尔日·阿米斯

比炸弹更大声
奈特·马歇尔

月光之星
卡罗尔·纳图昆达

青年舒迦
诺仙·阿巴斯

为了事业而叛逆
廷斯·卢巴德

刻不容缓
赵颖

绿色建筑
卡洛斯·巴特萨奇·考克

革命：文明的伟大壮举之一
卡莱德·尤瑟夫

教科文组织

2011年7月-9月

信使

ISSN 2220-3575
e-ISSN 2220-3583



作者或采访对象

2010-2011 国际青年年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国际青年年（2010年8月至2011年8月）启动和国际青年日的致辞中写道：“距离实现2015年的千年发展目标只有5年的时间了，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鼓励青年人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

联合国大会于2009年12月宣布的联合国国际青年年以对话和相互理解为主题。她旨在推广和平和尊重人权的理念，并鼓励不同代际、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进行对话和了解。

今年，以“阿拉伯之春”为首，众多青年正是在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世界各地的青年提高他们的声音，要求在未来的国家中占一席之地。2011年10月17日至20日召开的第七届教科文组织青年论坛将给他们提供机会表达经验、展示项目并交流思想。

教科文组织自创建以来对青年怀有浓厚的兴趣。教科文组织青年计划旨在提高青年的机会，使他们拥有更多的责任并使社会承认他们的作用。

2010年2月至2011年2月，教科文组织共同主持了为了青年发展的联合国机构网络、联合国青年计划。教科文组织参与了国际青年年的协调工作。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教科文组织

2011年7月-9月

信使

创刊64年

2011年第3期

《教科文组织信使》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出版，目前有七个语言版本，季刊。

法国，UNESCO
7, place de Fontenoy
75352 Paris 07 SP

订阅免费电子版：
www.unesco.org/zh/courier

出版主任：埃里克·佛尔特

主编：雅斯米娜·萨波瓦
j.sopova@unesco.org

编辑秘书：卡捷琳娜·马可洛娃
k.markelova@unesco.org

编辑：

英文：凯茜·诺兰

阿拉伯文：卡来德·阿布·黑杰

中文：王伟英

西班牙文：弗朗西斯科·维森特-桑多瓦尔

法文：阿尔诺·弗朗索瓦-德米尔

葡萄牙文：安娜·露西亚·基玛拉里斯

俄文：伊琳娜·克里沃娃

实习生：瓦纳萨·梅林

图片：达尼卡·比杰加克

版面设计：牛津大学基线艺术有限公司

印刷：教科文组织

咨询和复制权：

+33(0)1 45 68 15 64 k.markelova@unesco.org

网络平台：查克·皮罗，范文勇

致谢：艾米拉·卓列娃，实习生

欢迎非商业性转载。转载时请注明作者、日期、刊号和“转载自《教科文组织信使》”字样。

所有文章代表的是作者的意见，并非教科文组织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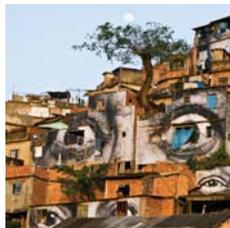
可以转载版权属于教科文组织的图片，转载时请注明“©教科文组织和摄影师的名字”。如需高分辨率的图片，请和图片库联系：photobank@unesco.org

地图的边界线并不代表教科文组织或联合国对任何国家、领土表示任何看法。



《摩达贝拉》，混合技术，2009年。黎巴嫩造型艺术家加桑·哈尔瓦尼的作品。

© Ghassan Halwani



社论 — 伊琳娜·博科娃，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5

看青年怎样改变世界

世界青年如此不同，却又如此相似

7

卡捷琳娜·马可洛娃采访莫妮卡·科尔曼

为了生存 — 埃姆娜·费托利

9

移动革命 — 琪琪·易卜拉欣

11

愤怒的春天 — 埃尔弗雷多·特鲁希略·费尔南德斯

13

从前有一群青年……

15

捷克青年要求发言权 — 马修·庞纳德

16

奥巴马，我最好的朋友 — 巴巴哈·马琳松

18

赛尔日·阿米斯和他的神奇武器 — 塞伦·德米尔采访稿

20

陷入暴力循环 — 米拉·卓列娃

22

当诗歌比炸弹更大声 — 奈特·马歇尔

23

人各有梦，但…… — 对话夏米尔·特瓦夫侯芬、布莱特兰德及沙欣

25

撰稿：I·J·比由勒、K·阿布·伊耶勒

JR, 艺术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雅斯米娜·萨波瓦

30

帕特里莫尼托在多哥 — 卡捷琳娜·马可洛娃

31

创造力的奇迹 — 西尔维娅·贝隆、皮埃尔·阿劳德

32

体育：只是一个起点

33

青年奥运会

33

月光之星 — 卡罗尔·纳图昆达

34

巴鲁基斯坦的青年舒迦 — 诺仙·阿巴斯采访卡丽达·布罗希

36

静悄悄的革命 — 柳泽大树

39

为了事业而叛逆 — 延斯·卢巴德

40

刻不容缓 — 赵颖

44

自行车上的生活 — 露丝·佩雷斯·洛佩兹

46

绿色建筑 — 卡洛斯·巴特萨奇·考克

48

嘉宾：

革命：人类文明的伟大壮举之一

50

哈立德·阿布·希吉拉采访卡莱德·尤瑟夫

里程碑

教科文组织欢迎

53

希拉里·克林顿、潘基文、弗雷斯特·惠特克、沙希·塔鲁尔……



本期内容

“我们的重点不是要改变整个世界，其实我们的重点可以只是改变我们自己的世界。”美国女演员和歌手莫妮卡·科尔曼如是说。她是联合国2010-2011年国际青年年的“青年捍卫者”（第7-8页）。这正是青少年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正在改变需要改变的事物。

2011年初，首先在突尼斯（第9-10页），后来在埃及（第11-12页），青年们挺身而出，反对现有政权，为世界上其它国家上了一堂很好的民主课。这一运动通过社交网络传播到了该地区的其它国家，还唤起了欧洲国家——如西班牙——的运动（第13-14页）。在每一处，他们的工具、口号和目标几乎都一样。他们争取就业机会、社会公正、免费教育和保健、言论自由以及最重要的一——民主。“阿拉伯之春”鼓舞人心的消息传遍了世

界，成为青年领导和平革命的象征。

在世界其他地方，青少年们以不同的方式动员起来。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学生们决定“插话”国家事务（第16-17页）；又比如那位为弱势学校创建社交网络的南非女实业家（第18-19页）；以及那些相信自己通过艺术的“神奇武器”能够战胜种族主义、仇外歧视和冲突的青少年们（第21-30页）。

这些青少年的一个共同点是团结，这一点不仅从青年志愿者、童子军和运动员的活动中体现出来，而且在一些令人心碎的故事中，如乌干达的“星星”（第34-35页）和巴基斯坦的青年“舒迦”（第36-38页）的故事中得到体现。至于日本青年，他们在2011年3月的灾难期间显示出了非常的慷慨，他们促使了以

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旧的价值体系的根本改变（第39-40页）。

最后，我们毫不惊讶地发现，青少年们对环境的未来非常担忧。新一代对气候变暖问题尤其敏感，他们与各种形式的生态惰性展开斗争。从欧盟到中国、墨西哥和秘鲁（第40-49页），成千上万的青少年正在发挥他们的各种才能，为了一个更健康的地球而努力。

本期杂志的文章均由青年作者撰写。在结束之时，我们请埃及导演卡莱德·尤瑟夫就“阿拉伯之春”发表意见（第50-52页）。关于今年年初震动埃及的事件，及其对世界、社会和国际政治的影响，他与我们分享了他的看法。■

雅斯米娜·萨波瓦

社论

伊琳娜·博科娃



© Jason de Caires Taylor/Greenpeace

↑ 英国艺术家佳桑·得开罗·泰勒的水下布景《默默的演变》，表明海平面升高的危险。2010年坎昆（墨西哥）气候变化大会之际，她的作品展示了一些年轻人在淹没了400具雕像的世界里的演变。

他们的数量超过十亿，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世界15-24岁的青少年人口代表着十亿多个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十亿多个用建设性的方式改变世界的想法，十亿多个解决当今问题的可能方案。无论他们有无学位、生而自由还是正设法获得自由，青少年们正重塑文化，掌控新型媒体，重建互相联系的方式。然而，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够享受无忧无虑的青春。他们大多数人每天都在与贫穷、失业、气候变化、有限的教育和保健服务等障碍作战。当他们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又怎能充分参与对未来的创造？我们必须帮助和支持他们去施展抱负，为他们提供利用教育、科学、文化、通讯和信息等海量资源的机会。

“阿拉伯之春”的浩荡浪潮，展示了青少年使我们惊讶的、开拓可能性的能力。2011年——联合国宣布的国际青年年（2010年8月-2011年8月）——将作为青少年选择高举人类尊严火炬的一年而被人们记住。

教科文组织马上动员起来，为这些转变中的、正处于历史转折点的社会提

供了支持。在突尼斯和埃及，教科文组织着重于培训记者，分发教育材料，帮助即将举行的选举强化言论自由和促进媒体变革。我亲自去了那里。在开罗，我倾听当地的需要，并加强教科文组织在其主管领域的干预作用。5月3日在突尼斯，由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庆祝活动，开辟了辩论，引导了关于青少年关键问题的讨论，如互联网和社会性媒体在反审查制度上的作用。6月，我们是第一个在埃及以论坛形式推出系列研讨会，讨论公民参与和民主的组织。

文化是新建民主社会的一个坚实基础。埃及青年证明了他们在示威活动中特别关注对文化的保护，他们围绕亚历山大图书馆自发形成了一条人链，保护它不被趁火打劫。教科文组织希望鼓励青年的这种意识，这种集体的成熟。教科文组织将会通过“青少年世界遗产教育”倡议，对此提供长期的支持，这将使一份独特遗产的继承者们得到更多机会感受这份遗产所传递的古老价值观，并把它作为一个凝聚社会和创新的工具。

→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于2011年5月22日首次正式访问克罗地亚之际，在波雷奇召开了第一届东南欧世界遗产青年论坛。伊琳娜·博科娃（穿白色套装）在2010-2011年国际青年年的庆祝活动中引人注目。

© UNESCO / Bobir Tukhtabayev



按同样的精神，我会在今年九月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下一次东南欧洲国家首脑会议上，推出一个“遗产与对话”倡议。这个塞尔维亚的首都是一个“剧院”，曾上演过为该地区带来民主的那次决定性革命：即由Otpor（抵抗）组织领导，导致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政权垮台的塞尔维亚青年革命。此事件发生10多年之后，因该地区仍在努力获得和解与民主，教科文组织希望通过动员所有的文化力量来帮助他们开发项目，促进对话和相互尊重，为青少年提供方法来实现他们的抱负。这就是教科文组织“青少年世界遗产教育计划”的主要宗旨。

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第一个界定和开发具体青少年计划的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教科文组织就已经着手组织国际青年志愿者工作营，以帮助欧洲重建。今天，我们提高全民教育的质量，为处于冲突地区的学童和学校提供保护，提供更好的专业培训，从而为实现一个更光明的未来创造条件。此外，我们还帮助世界不同地区的青少年之间建立起基于人权共同价值观的关系。为此，我们组织刚刚制作了一部短片，由来自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巴

→ 涂鸦拳头象征导致了2000年米洛舍维奇总统下台的塞尔维亚青年运动Otpor（抵抗）。埃及青年在起义中使用了同样的符号。这张照片拍摄于2011年4月8日通向塔利尔广场的默罕默德·马哈茂德路上。塔利尔广场是2011年1月起义的主要场所。



西、布基纳法索、加拿大、法国、印度尼西亚、黎巴嫩、乌干达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教科文组织相关学校的学生参与制作而成。在片中的各个场景，这些学生自由表达他们对性别、多样化、暴力和排斥的意见，这是提供给世界各地中学的重要教育材料。

青年是促进全世界进步的一股力量。让我们使他们能够畅所欲言，充分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提高我们的认识，并开放封锁的视野。这就是教科文组织通过其促进公民参与和社会创新的青少年计划所追求的目标。

青年计划联合委员会促进教科文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该委员会由青少年组成，参与教科文组织青年事务，尤其是教科文组织青年论坛的筹备。自1999年以来，该论坛与各国政府、民间团体和联合国系统的机构合作，每两年举办一次，创造条件让青少年得以向国家当局提出建议，鼓励他们把想法付诸实施，并跟进他们的实施过程。今年第七届教科文组织青年论坛将于2011年10月17日至20日举行，这将是倾听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的意见，发现他们的需求和观点的一个极好机会。

青年怎样改变世界，是教科文组织的193个会员国和民间团体的青少年代表要讨论的议题。会议将从青少年参与的角度研究和平文化、良好治理和经济机会。会议还将审核国际青年年的成就和经验教训，特别是联合国2011年7月举办的青年高级别会议的结果。

在对这一重要事件的期待中，教科文组织将在7月推出一个在线筹备运动，让青少年发表意见，提议他们最关心的那些主题。这些讨论结果必将滋养10月青年论坛的辩论。

教科文组织一直把青少年作为建设一个更公正世界的重要伙伴。青少年总是呼吁我们去创新，去发明。每天这种积极势头都会呈现给我们更多的例子。我希望这一期《教科文组织信使》会激发每个人行动起来。祝各位阅读愉快！■

在诸君呈现的
高贵的精神、
绚烂的青春、
高效的
联络、
纯洁的理想
主义、
以及对我们
共同人性的奉
献中……

我找到了希望，去克服前方过渡时期的重重困难及挑战，完成你们发起的革命事业，以及建设因你们的行动而成为可能的更美好的埃及。

——伊斯迈尔·萨瓦格丁博士，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

2011年2月12日

世界青年 如此不同， 却又如此相似

卡捷琳娜·马可洛娃采访莫妮卡·科尔曼

↓莫妮卡·科尔曼在印度期间的欢乐时刻。脱口秀《我要和莫妮卡说话》
图片库。



作为联合国“青年捍卫者”，31岁的美国歌手和演员莫妮卡·科尔曼的使命是提高公众对国际青年年（2010年8月至2011年8月）的主题（即“对话和相互了解”）的意识。她的目标是不让这一使命停留在一纸声明上，而是真正为青年提供表达想法和意见的机会。

2010年11月你被联合国委任为青年捍卫者。三个月后，你出发进行环球宣传。你的目标是什么？

此行既是为了推动国际青年年，也是为了我个人。在生活的某个时刻，让自己走出舒适区，离开那些熟悉的事物，通过别人的眼睛去发现新的东西，是很重要的。生活在美国，我感到自己对世界其余各地所知甚少。作为青年先锋和一个人，假如没有亲眼目睹过，我无从何而谈贫困；假如从未遇见过任何做出杰出事迹的青年，我也无法谈及青年人能取得的惊人成就。

在阿拉伯国家的动乱中，青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是否改变了你对使命的看法？

我环球宣传的第一站最初打算是在突尼斯。而我打算出发的那天，

我们的重点不是要改变整个世界，其实我们的重点可以只是改变我们自己的世界。

国际青年年：
<http://www.un.org/zh/events/youth2010/>

© Gimmemotak

正是动乱爆发的这天。出于安全原因，我们不得不改变了行程。我此行的任务之一，是在问题加剧、成为动乱之前，设法说出这些问题。我现在在旅途中所能做的一件事，是去了解这些在底层涌动的问题，并使人们认识到这些问题。

这些年轻人的反应，是他们对有生以来经受的痛苦，及其家庭和父母承受一生的痛苦、战争和折磨的不满情绪的爆发。我认为他们并不想搞破坏。他们只是采用了他们唯一知道的方式作出了反应，不能因此而指责他们，但我更愿意寻求不同的和平的解决方式。我想提醒所有的年轻人想想马丁·路德·金、甘地和纳尔逊·曼德拉采取的方法。

在今年二月菲律宾人庆祝和平革命（即结束了马科斯独裁统治的革命）25周年的那一天，我在当地。菲律宾的革命能够让妇女（包括孕妇）和儿童参与，众志成城，为了同一个目标努力，而没有人死亡。这才是我想要的那种革命。

在你的在线访谈节目《我要和莫妮卡说话》中，你强调互联网的力量赋予了青年们发言权。

《我要和莫妮卡说话》的确是一个青年平台。它是我谈论被人们忽略了的事物的地方，我尝试从不同的角度谈论这些事物。我也在那里采访名人、专家和我在世界上遇到的人们。

这个节目的主要目的是帮助青年们，让他们发现自己敬仰的人拥有和自己相似的兴趣，他们没有什么不同，以及打破刻板印象。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采访了住在墨尔本公房里的一位穆斯林青年难民。她21岁，戴着面纱，完全否认关于穆斯林女性的古板成见，即她们依然受到压迫，没有发言权。

你在行程中遇见的青年都一样呢，还是每个国家的青年都不相同？

青年人其实很相似（笑）！他们最大的区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对世界时事非常了解。他们不得不这样，因为这些事就发生在他们的门前，他们可能在上学路上就会遇见。

而在发达国家，有时我们可能会不太了解世界时事。我们往往身陷自己个人事务的漩涡中。

青年们提出的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

在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最大的挑战是自尊，帮助青少年找到

更好的自我感觉。自杀是一个大问题。

而在孟加拉国，情况几乎相反。我采访的一个学生说：“当我们在这里为了生存而争扎的时候，发达国家的人们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你怎么能指望他们认识到这些。”这句话真正振聋发聩。这说明了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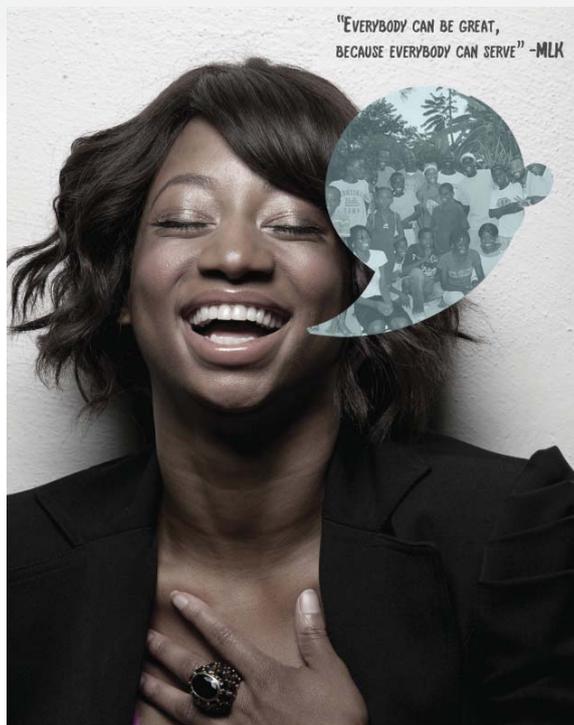
青年们相同的一点是，每个青年都在寻找在这个世界上自己的位置。我试着向他们解释并说服他们，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属于哪个社会经济阶层、来自什么宗教背景、拥有何种特权或处于何种劣势，他们都拥有无限的可能性，要相信自己的价值和潜力。我们都需要克服的障碍。我们必须自己来克服这些障碍。而我们一旦克服了它们之后，重要的是去帮助解放世界上的兄弟姐妹。

我们的重点不是要改变整个世界，其实我们的重点可以只是改变我们自己的世界。因为如果每个人专注于改变自己的社区或村庄，合起来我们就将改变整个世界。

国际青年年结束后，你还想继续支持世界各地的青年吗？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我打算把重点放在《我要和莫妮卡说话》上。我希望它能成为互联网上采用新技术的一个互动场所，并向电视平台发展。

在我的演艺生涯中，我想演那些有助于加强和推动这一运动发展的角色。我认为，娱乐和艺术是加强任何信息的一个绝妙的方式。通常，当我和人们谈及他们为什么决定有所作为，他们为什么加入某个组织，他们为什么会热爱某一事物，他们往往会追溯至一本书或一首歌曲或一部电影。因此，我想继续创造这种激发灵感的机会。■



↑ 《我要和莫妮卡说话》海报。这是莫妮卡·科尔曼为青年人设计的平台。

这些年轻人的反应，是他们对有生以来经受的痛苦，及其家庭和父母承受一生的痛苦、战争和折磨的不满情绪的爆发。



← 突尼斯革命一景。突尼斯。2011年1月底。

在学生埃姆娜·费托利看来，2011年1月的突尼斯青年起义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它对处于压制边缘的青年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埃姆娜评定了互联网在起义中的作用，分析了起义的几个深层原因，并讲述了她的地狱经历。

© Nasser Nouri

埃姆娜·费托利

为了生存

2011年1月10日，我在脸谱网上看到，人们准备在突尼斯市举行示威活动。我和同学们约好了1月14日在内政部外面集中。我们在市中心哈比卜·布尔吉巴大街和卡斯巴广场举行了三天示威活动。如大多数突尼斯青年一样，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在脸谱网上安排好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评论家称我们这次运动为“脸谱网革命”的原因。但现实要复杂得多。事实上，这些社会性网络只是青年们的一个工具，我们利用这个工具安排行动、引发社会变革、反对失业和其它形式的羞辱，并维护人权和尊严。

话虽如此，完全贬低互联网的作用是错误的，因为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过程证明，它不但反映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多样性，还是一个极好的工具。而且它还是应对审查制度的有力武器。现在，没有人可以说：“我是唯一的主人。这事归我管。”互联网提供了建设性的辩论机会，阻止了这样的独断行为。它也教导我们什么是“辩论”的真正含义。

突尼斯之前的革命均以“革命专政”告终，结果众所周知。今天，我们是一次正迈向民主的非暴力“文明革命”的组成部分。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文明——媒体和分析人士对这次革命的“和平”性质多有提及，因为青年们手无寸铁地走上街头。我们需要小心选择我们的用词。这种和平，是对谁而言？对于日复一日生活在恐惧中，为了避开乱飞的子弹而蹲下的人们而言，这是和平吗？对于挣扎在职责和个人信念之间的士兵和警察们而言，这是和平吗？对于从未见过这么多血四处流淌的青年示威者而言，这是和平吗？我们所经历的地狱可能比不上我们在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的兄弟们所经历的那么致命，但我们仍然经历了一些可怕时刻。

我目睹人们的尸体；我被吓坏了；我中了催泪弹晕了过去……。来自西迪布济德——即1月4日穆罕默德·布阿吉吉自焚事件发生的城镇，这一事件引发了革命——的数百人来到了突尼斯市的卡斯巴广场，加入首都的示威队伍。有些人携妻带子，他们又冷又饿，挺凄惨的。我帮着童子军们给他们送去食品和毛毯，还给负责童子军医疗服务的医生帮忙打下手。

但我做得更多的是大声呐喊。连续数日地呐喊。我竭尽全力地喊“滚出去”，直到本·阿里逃离突尼斯。这个政权使青年成为最无助的受害者，我要结束这个政权的统治。

我们没有成为国家经济的驱动力，相反，我们成了替罪羊。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青年人是第一个挺

身而出的群体。事实上，我们已经陷入陷阱。一方面，我们接受的应该是非洲最好的教育之一，但在现实中，它没有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同时，本·阿里的政权制度不允许我们找到并保留工作。让员工获得最新技能的继续教育，在突尼斯是不存在的。例如，在信息技术领域，当技术有所更新，企业所做的是重新招一批软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工作不安全感，与青年毕业生一开始就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一样令人窒息，成了一种疾病。我想知道，在全国范围，有没有人的家里是连一个失业毕业生都没有的。

不稳定的教育体制和特别见利忘义的经济政策，使得青年一代感受到了虐待、剥削和压制。我们前几次起义都是为了生存。我们未来的行动则将成为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进程的组成部分。■

埃姆娜·费托利，21岁，突尼斯人，是突尼斯文学和人文研究预备学院的二年级学生，她在那里学习法语。她是突尼斯市南郊哈姆利夫区的童子军队长。



© Momiya Agrebi

↓ 人民的呼声。突尼斯，2011年1月27日。



© Hamdeddine Bouali

移动革命



24岁的埃及青年活动人士琪琪·易卜拉欣在2011年埃及革命中。

© Al Jazeera English

在2011年1月埃及革命的高峰阶段，一个青年女子通过脸谱网和推特微博动员群众；她不断向全世界的互联网社区通报情况；她组织了街头集会，挥舞着横幅……她的移动电话总在伸手可及之处。她就是琪琪·易卜拉欣，24岁，阿拉伯革命中高科技一代的一个完美典范。与琪琪一起上街游行的同胞中，并非所有人家里都有电脑，很多人没有。然而，在这次改变世界（不仅仅是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事件中，社交媒体在组织筹划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琪琪·易卜拉欣接受哈立德·阿布·希吉拉的采访

你在2000年至2008年期间居住在美国。22岁时你回到埃及，并立即投身于社会政治舞台。你在美国的时候已经是一名积极活动人士了吗？

是的，在美国期间我对于当地问题，如移民法，参与得更多。我加入了一个争取非法移民权益的团体，因为警察执行的移民法是歧视

性的法律。我也参与了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许多活动。所以，每当有示威游行或反战呼吁活动，我肯定是其中一分子。

但说实话，那时由于我很少去埃及，对于埃及发生的事我很少涉及。而且，因为从14岁至22岁一直生活在海外，那时我的政治认识也不够。我不了解埃及反对运动，因

为它完全被主流媒体忽视了。所以，除非你住在这里，是埃及反对运动的一分子，不然你真地对其一无所知。即使是居住在附近的人也不一定知道。只有关系密切的活动人士、记者和政治圈子里的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可以跟琪琪·易卜拉欣的帖：
<http://twitter.com/Gsquare86>

我第一次与埃及的积极活动人士取得联系是2008年我从美国回来期间。然后，我在开罗美国大学选修了“专制政权统治下的社会动员”课程。我开始学习政治学，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参加了一些抗议活动，在那里我遇到了许多积极活动人士，由此我开始参与革命社会主义者活动。



© Hossam El-Hamalawy

↑ 移动电话成为埃及争取民主斗争中的重要工具

你能描述一下你在1月25日抗议活动中的作用吗？

我加入了一些政治运动团体，我们号召了1月25日的群众示威。我们协调示威的时间、地点和诉求内容。

当时我们最主要的诉求是逮捕内政部长哈比比·阿德利。因为2010年6月6日年轻网民哈立德·赛义德被警察虐待致死。其它诉求包括解散2010年底当选的议会和设立最低工资标准。街头抗议是我们把这些要求诉诸人民阵线的方式。

突尼斯起义后，阿拉伯人民开始相信自己有能力通过街头抗议及和平革命的方式引起改变。这也是我们的目的：把我们的运动，从一个仅是社会青年团体或政治团体的运动，推广为一个具有政治和经济诉求的民众运动。

我们的示威开始只有100人，后来我们的数量增至成千上万，人们不停喊着反政府的口号，成群结队地涌向市中心的阿尔-塔利亚广场。

人们来到广场，高呼和突尼斯人民同样的口号“人民要求政权下台”。虽然我们希望它会发生，但这并不在我们的有意安排之内。

有时候，我们拿自己开玩笑，说：“哦，我们在脸谱网上策划一场革命！”没有人相信我们的计划最终能演变成这样轰轰烈烈的运动。但谢天谢地，总算成事了，因为人们已经受够了，这些被压迫的人民为了自由会做出任何事的。

社交媒体在埃及的这些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呢？平民青年记者们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革命前，社交网络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不是革命的手段，但绝对是用于交流的工具。

在一个专制政权统治下，每一条新闻、每一家报纸和每一种大众传媒都至关重要。因此，平民新闻成了激进主义。公布真相，对国家设法查禁的事件提供相关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揭露和解释在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我们在革命前的唯一手段。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正在进行的抗议或罢工。只有通过社交网络，才能传到独立媒体和国际新闻机构如半岛电视台的耳中。这些工具是揭露发生在警局的酷刑案件的重要方式。其中许多视频是通过手机拍摄的。所有这些虐待行为都是通过Flickr相片分享社交网站、脸谱网和推特微博披露的，因为这些都是未经审查的网站，直到政府开始屏蔽它们。

应该说，那些走上街头进行革命的人们并不拥有如脸谱网和推特微博之类的这些工具，他们甚至没有电脑。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街

头，是为了获得良好的医疗保健、优质的教育和给他们的孩子一个更好的将来。

就算革命的人们与这些信息工具无关，但社交网络在传播信息、动员人民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作为一名阿拉伯青年妇女，你不觉得埃及妇女在1月25日起义中的参与开始打破阿拉伯传统的高墙了吗？

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无论是在中东地区还是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妇女一直是各种动员组织或革命的一部分。

这次在埃及，妇女们领导了罢工、喊口号和抗议，她们也被捕并遭受了酷刑。根据我在埃及起义中的经历，在动员过程或抗议活动里我们没有男女之间的差异。

不过，妇女们也争取自己作为妇女的权利。但是，她们遭到了反击，人们说现在不是做这个的适当时机。那么何时才是适当时机？*这不是中东独有的问题：在美国、英国和其它地方，妇女们也在争取自己的权利。

你认为，其它国家的青年有没有可能会受到启发，把阿拉伯革命作为一种和平的人民斗争模式，用于促进自己国家的改变？

不仅在本地区，在其它地区我们都已经看到这样的青年运动。比如今年3月26日伦敦的大游行。出现的横幅和标语与埃及的类似。一直以来，阿拉伯世界被套上刻板印象，被定义为一个落后而充满暴力的地区，以及恐怖主义之乡。这一次，阿拉伯世界被推为一个通过和平方式，自下而上获得民主，带来真正改变的例子。■

*请查看《教科文组织信使》2011年4-6月期“征服自由新天地的妇女”关于该主题的文章《此时不搏，更待何时》，报道2011年2月13日意大利的示威游行。

愤怒的春天

自5月15日以来，西班牙一直生活在示威和抗议的“气候”下，这些示威和抗议让世界大多数人出其不意地吃了一惊。面对“五一五运动”（或者简而言之，这些“愤青们”），我们困惑不解：难道西班牙不是一个与突尼斯和埃及非常不同的、先进、民主的国家吗？然而，近观该国，您会发现许多西班牙人觉得没人听取自己的意见，认为现有的制度剥夺了他们的前途。而西班牙青年决定为之斗争的正是前途。

埃尔弗雷多·特鲁希略·费尔南德斯

抗议活动是自发爆发的。“没有人预料到它的爆发。”出生于加的斯、在马德里工作的27岁记者克利斯妥巴·拉米雷斯承认。这一切都源于5月15日的马德里，由“现在要真正民主”团体和“无前途青年”团体组织的一次示威活动。后来，人们搭起了帐篷，示威活动蔓延到了全国各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称自己为“愤怒者”的示威者，发现他们原本由青年组成的队伍日益壮大，退休人员、各行业职工、清洁工，爷爷们带着孙子，小家庭带着幼儿都加入了进来。

这种愤怒是严重的经济危机冲击该国的直接结果。西班牙创造了西欧失业率的纪录：2011年第一季度达到了20.6%。在青年群体中，失业率达到了令人咋舌的44.3%。而在2007年，金融危机以前，仅有8.3%的人口失业。

← 《春》，拼贴和水粉画，2011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法国画家斯洛博丹·K·比杰加可专门为本期《教科文组织信使》而作。他的网站：<http://bijeljac2.free.fr/>



然而，即使在经济繁荣的年份，也已经有一些警告迹象表明“机器”正慢慢停下来。2005年8月，在《国家报》日报刊登的一封信读者来信中，一名来自巴塞罗那的女青年创造了一个单词，指那些年轻的西班牙大学毕业生，虽然手持多种文凭，会说多种语种，通常持有硕士学位，但每月收入却几乎不到一千欧元——这种情况是整整一代人的耻辱，虽然这一代的资历比以往任何一代都好，但是他们受到工作单位的剥削，受到社会体制的忽视。

在政治方面，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过去这几年一直穿插着涉及多数党成员的腐败案件，但几乎没有人受到审判。因此，在2009年社会学研究中心的一次调查中，会有百分之六十的西班牙人认为在联邦和地方从政者中腐败非常普遍，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在同一民意调查中，接受抽样调查的大多数人承认他们对政治阶层或体制没有多大信心。

经济危机、政治腐败、对民主制度信心的丧失——这些就是导致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愤怒青年走上街头的“鸡尾酒”的主要成分。

终于，我的国家苏醒了

5月15日，来自马德里的30岁女子米里亚姆·布兰科听说了在太阳门广场的第一次抗议。“终于，”她想，“我的国家苏醒了！”米里亚姆持有好几张大学文凭，会讲四种以上语言，从一开始就是运动中形成的几个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告诉我们：‘你们是国家的未来’。但我们既不是未来也不是现在。”她语气激烈，试图解释他们愤怒的原因。“我们不再害怕。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因为不但我们，连我们的孩子都没有前途。”她补充道。

克利斯妥巴在过去的几周加入了愤怒者在太阳门广场的许多示威活动。他说：“人们已经受够了。我们要求改变制度，使公民掌控政治权力——建立真正的、更具

参与性的民主。”每天，在马德里生活了五年的27岁英国女子奥利维娅·沃特斯穿行在市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帐篷和防水油布森林中。“我震惊地看到，公民想要让自己的意见被听取变得有多难。”她说，“在我看来，他们想要得到的不过是有人听取并认真对待他们的意见……。”

来自拉科鲁尼亚的32岁的政治评论员比托尔·佩蒂阿多透过抗议浪潮看到了背后的愤怒。“这是对经济危机的一种愤怒反应，经济危机不是工人们造成的，然而，奇怪的是，他们却是那些为此付出代价的人。”正如在过去几年中其他数百名西班牙青年所做的，比托尔不得不走出国门寻找工作机会和一份他无法在自己国家挣到的薪资。他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高兴，说：“这是第一次大家认为问题出在制度本身，这种我们只是每四年投票表决的民主，与现有的经济制度一样，已经不再适用。”

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有如此大规模的运动质疑建立在党派基础上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合法性。

米里亚姆还强调，运动的主要宗旨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公民参与，这可以通过使用新技术来鼓励。”在任何地方，在所有的会议和辩论中，人们多次重复，从政者必须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不是银行和大公司的利益。该运动还坚决把政党和传统工会排除在他们的抗议活动之外，以强化其大众、基层、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制度”的特点。

未来会明白

但是，关于这一运动的目标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一直没有明确的表述。对于米里亚姆而言，这是因为该运动的进程仍然处于初期阶段。“关于‘如何实施’的问题仍在商讨中。我们现在处于反思阶段，在这个阶段大家意识到必须要



↑ 埃尔弗雷多·特鲁希略·费尔南德斯，西班牙记者，31岁，目前在教科文组织网络编辑组工作。

有所改变。通过讨论和辩论面临的问题，我们最终会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她解释说。克利斯妥巴认为，现在是对现有体制进行变革的时候了，目前的体制“对贫困阶层所面临的问题无所作为”。比托尔承认许多想法仍然“非常笼统”，而且他们的诉求还很“模糊”。但是，他补充说：“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有如此大规模的运动质疑建立在党派基础上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合法性。”奥利维娅认为，目前有关细节和清晰度的缺乏是对危机本身和西班牙面临的问题规模之大的反映。而且，她总结说：“有这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们不知从何入手。”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情况，虽然缺乏定义，有可能会成为这一运动，在不久的将来，拥有明确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清晰的路线图的大纲。而且，谁知道呢，它也许会成为其它欧洲国家，即同样受危机所害，拥有与西班牙同样民主精神的那些国家的“愤怒者”跟随的榜样。但是，如果起初几周的能量开始消退，“五一五运动”很可能会消失在时间之沙中，成为2011年这个充满希望和愤怒的春天里的另一件轶事而已。■

从前有一群青年……

“68年5月运动”一年后，《教科文组织信使》出版了一期《青年1969》*，以表达“愤怒的青年”、“拒绝和激情的这一代”和“世界各地青年的不满”。从许多方面来看，“1968年青年抗议的突然爆发”类似“2011年阿拉伯之春”。《与社会搏斗》一文的摘录语会说服我们。

“青年的绝对需求再也无法适应世界的不公正和无序。”

勒内·马厄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青年出现在法定的不同集团，其根本冲突大概在于青年认为他们在社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和尊重。”

“现代交流工具使人们能够无国界障碍认识不同文化，青年好像在全球范围内组建了一种国际化——独特的青年文化。”

*这一期杂志仅有英、法、西文。
www.unesco.org/courier



图片 © Snark International - Grazia Neri

“我们要求自己的意见被听取，你们拒绝了。
我们要求公平，你们称之为无政府主义。
我们要求自由，你们称之为放纵。”

↑ 《教科文组织信使》《青年1969》刊物第四页上的摘录语。

“他们希望人类关系（与我们给他们的关系相比）更加坦诚、更加自由、更有亲情。他们担心（我们将他们推进的）国际秩序和国家秩序具有严重的不公平，他们不想成为帮凶。”

“或多或少宣告了起义的青年们表明自己拒绝种族隔离。他们反对社会惯例，揭露‘生产为了生产，消费为了消费’的神话。”

捷克青年 要求发言权

马修·庞纳德

“让我们插话！”是由三位捷克青年发起的一个项目。他们的目的是给16岁至26岁的青年同胞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对与己直接相关的事宜发表意见。这对捷克青年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思想实验室，也是民主的一个真正进步。

他们的名字是简、简娜和婕卡。他们的年龄才二十多，每个人都曾先后参与捷克的一些非政府青年组织。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对很多主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在协会内部、在生活的城镇、在欧洲范围内——为什么不可以——发表意见。直到现实让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声音在国家层次几乎没有人听！“所以我们决定改变这一情况。”简·胡萨克解释说。他23岁，在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研究欧洲事务，兼任2010年开始的一个项目的协调员。“在那以前，只有诸如全国儿童和青年理事会之类的机构的活跃成员——换句话说，已经参与在民主进程中的青年，才有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补充道。而其他青年都被排除在外……。

显然，捷克青年没有遇到如乌干达等国青年遭遇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受到歧视。“我们有过一些不愉快的经历……，”简说，“有一项关于引进新型全国中学毕业会考的决定，对青

年人有直接的影响。一些青年对此发出了一份请愿书，并举行了游行反对此事。然而，尽管捷克共和国青年政策的一个重点是让青年参与国家事务，那些政客甚至没有接受请愿书的风度！套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我认为‘丹麦的国事，必然有些污七八糟的’——只不过这里丹麦换成了捷克共和国！”正是这一事件导致了“让我们插话！”的创立。它的创始人想要显示，从政者应该，并且必须，有礼貌地按照民主原则承认青年们有对国家发表意见的权利。

自从那之后，国家根据年龄、问题和期望，在与青年相关的若干问题上，从高等教育的收费问题、16岁投票权问题、学校社团入会仪式和勒索的问题、大麻合法化问题、性教育问题，青少年就业机会问题，到有争议的“弃婴盒”等问题上，都征求了他们的意见。自2005年以来，有一个名为Statim的遗弃儿童基金会，在捷克共和国全国放置“弃婴盒”，帮助处于困境中母亲们，使她们可以把婴儿留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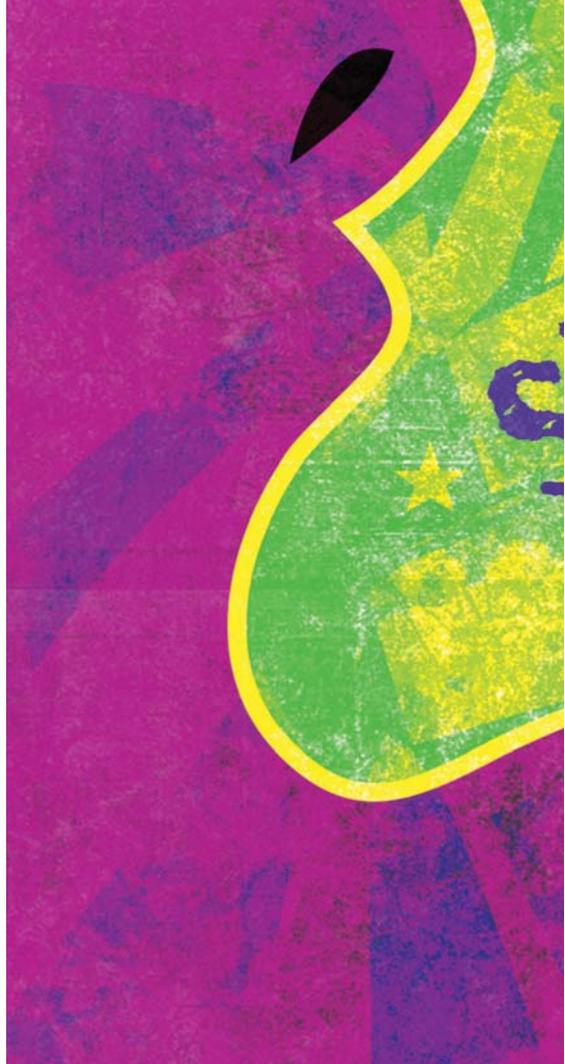
一个安全的地方，远离人们窥探的眼光。

和其它世界各地的青年一样，这些年轻人，无论是失业者、学生还是有固定工作的人，他们都使用脸谱网，推特微博和互联网来进行交流和集体行动。

“让我们插话！”是如何运作的？

从实践角度来说，青年们首先使用互联网和社会网络对一个特定主题进行投票。然后“让我们插话！”浏览“支持”和“反对”的论点论据，收集有用的信息供以后讨论用，而这些讨论是在全国各地举行的公开辩论的组成部分。

在第二个阶段，组织者的作用只是为讨论提供便利，直到达成共识。“让我们插话！”还邀请青年志愿者自行组织研讨会和讨论组，地点不限，可以在教室、青年俱乐部，或甚至就在一家咖啡馆里。





© www.youthweek.eu

◀ 欧洲青年周海报，2011年5月15日至21日。

样做就不是民主了。折衷办法就要折衷才行。”简非常明确。“就个人而言，我认为我们的组织是一个很好的民主学校，因为我们创建了这种折衷的立场，并取得了相应的进展。但是，我们依然处于试验阶段！我原来投入创建这个组织是基于一种我认为有意义的理论……。而我想看看这个理论是是否能够付诸实践。最主要的是同时我们也想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如果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可以得到结果。这有教育意义，是很好的正面例子，证明我们的做法是有效的，我们能够提高青年在国事上的参与程度。”

一个民主实验室

“让我们插话！”是一个独立协会，不接收私人赞助或政党提供的资金。它得到一些青年非政府组织和捷克儿童和青年理事会的支持。捷克教育、青年和体育部（教育体育部）对该组织作出了一个承诺：教育体育部的办公室会把该协会最后会议的结果，作为关于青年意见的内部报告来对待。“这正是我们想要的，”简热切地说，“我们希望，青年们运用民主原则发表的意见，能被官方政治体系听到，能与其他人的观点一起被纳入考虑。”

作为一个实验，“让我们插话！”得到了欧洲“青年在行动”计划，以及欧盟执委会驻捷克共和国代表的支持——“让我们插话！”的协调员并不否认这一欧洲关系。“我们也是欧盟‘与青年进行建设性对话’倡议的一部分，”他说，“该倡议关于青年就业的主题对话时间超过18个月，历经3任会长任期（西班牙、比利时和匈牙利）。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与教育体育部合作编写了一份报告提交给欧盟。大多数我们讨论的结果在欧洲政治进程中被采用，这令人欣慰。同样的，欧盟执委会、欧洲议会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正在讨论我们



© Czech Council of Children and Youth

↑ 23岁的简·胡萨克，“让我们插话！”创始人。

提交的结果……。这使我们非常开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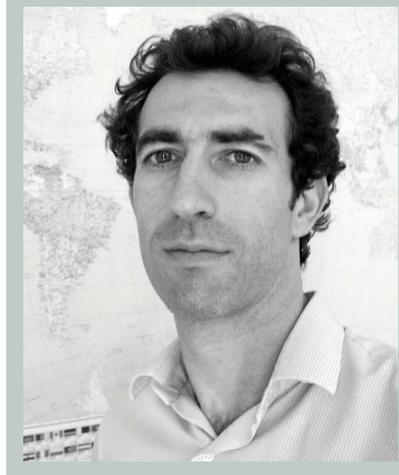
在捷克这个国家，青年总能勇敢地面对当权者，试图进行改变。目前，“让我们插话！”还是独一无二的。到目前为止，该组织只与斯洛伐克的合作伙伴建立了联系，这让他们能够与一个周边国家进行比较。但是，这种首创的倡议值得各地的推广，因为它面向的是一个国家的所有青年，并使整个国家的青年都能获得对与自己相关问题的发言权。■

重要的是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如果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可以得到结果。

在最后的阶段，表决结果会在一个总结会议上提交给媒体、从政者和专家们，在会上青年们有机会再次质疑决策者们。然后，会议结果会递交给政府、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们。

“在不少问题上，我个人的观点与最终被采纳的观点没有很大区别，这些最终的观点往往覆盖面相当广泛。有时候我很想把观点往某一特定方向引导……。但那

马修·庞纳德，34岁，是一名法国记者，现居布拉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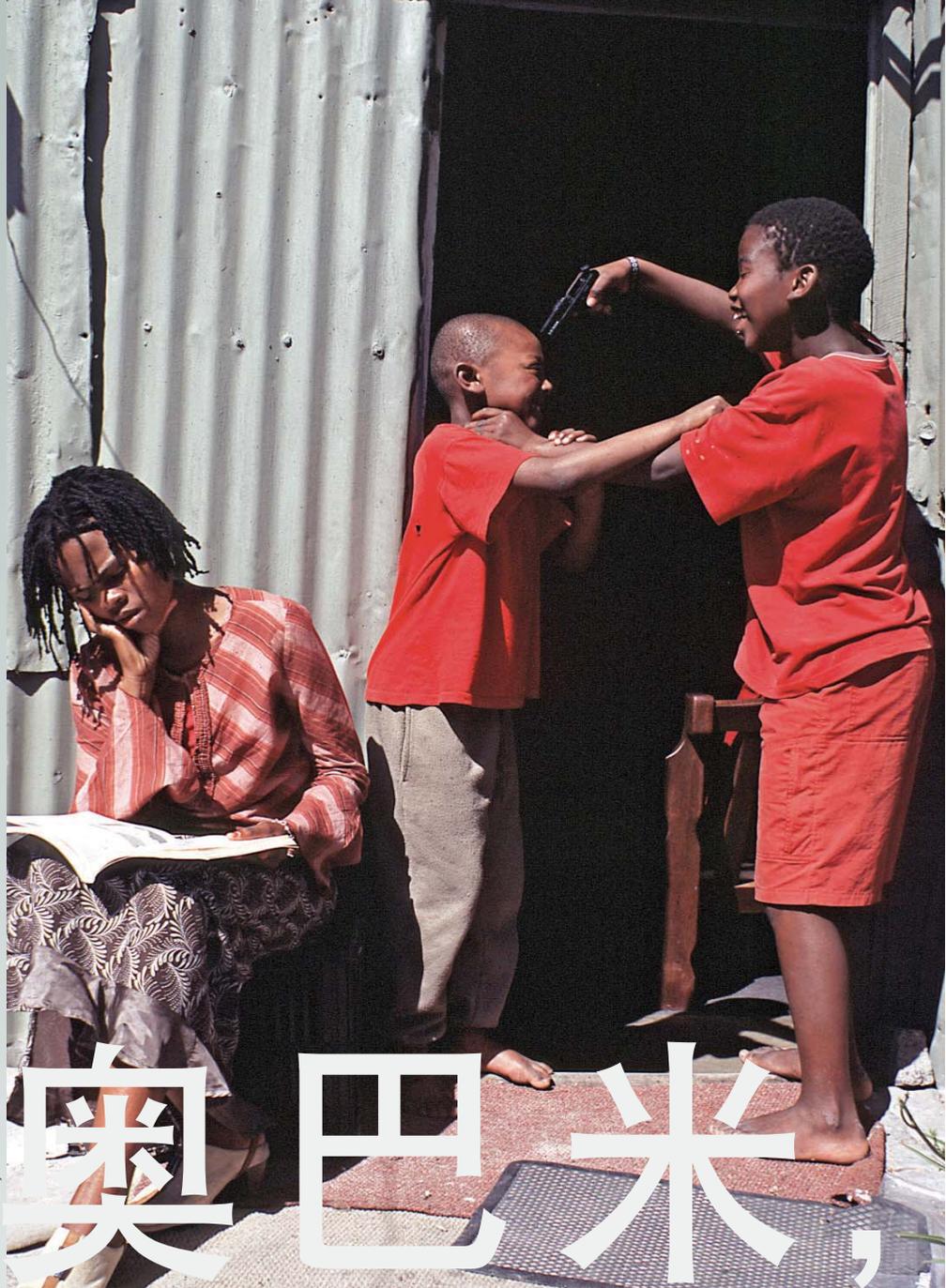
© DK

2008年，南非女青年巴巴哈·马琳松构想出了奥巴马。现在，奥巴马已经是南非学生的好朋友。既非白人，也非黑人，奥巴马是个虚拟人物。他希望能为优质教育、优质生活献上一份力。奥巴马的设计师讲述其故事。

巴巴哈·马琳松

我在约翰内斯堡的富裕郊区长大，有幸接受了私校教育。作为一所私立学校的年轻白人学生，这意味着种族隔离末期南非经历的痛苦，我多少有点置身其外。但和我所有南非同胞一样，我特别珍惜一些时刻，如曼德拉的释放和他的就职典礼，和2010年的世界杯。这些时刻定义了我们新的民主时期，以及我们至今的民族精神。

我一直想自己创业，但直到我完成在开普敦大学的商学学士学位，并在伦敦的企业界历练了5年之后，奥巴马才诞生。开始时（2007年），奥巴马是一个开放的通用社交网站，但在脸谱网超出大学网络对外开放以后，我决定将奥巴马的目标锁定在学校，包括小学和中学。现在，奥巴马是一个社会学习网络，促进教师、学生和家长之间的交流和学习。它顺利结合了与一般社交网站（如脸谱网）类似的联络工具，以及全面学习管理工具——如那些在Moodle平台（免费的网上教育平台）上能找到的工



© UNESCO/Darryl Evans

奥巴马， 我最好的朋友

具。所有这些工具均有机结合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内，因为它针对的主要目标是儿童。

该平台始建于伦敦，但在2008年我回南非的一次途中，我决定将奥巴马搬回老家。我想，如果它在非洲能成功，理论上它会在任何地方成功。而更重要的是，如果确有成效，它会在最需要它的地方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南非，一个具有显著深厚文化组合的美丽国家，在新的民主社会诞生整整17年后，仍然在与各种社会政治挑战作斗争。艾滋病/艾滋病、犯罪、基础设施薄弱及管理不善只是其中一些原因。南非是世界上教育方面表现最差的国家之一：根据2011年1月的一份官方公报，2010年只有23.5%的中学毕业生能进行教育深造。

◀ 在南非的一个贫民窟，一个女孩在家门口做作业。

南非的基尼系数达0.68，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Bloomberg于2011年2月25日公布的数字）。我们知道，基尼系数从0到1.0表示完美的收入公平。由此可见，南非的收入分配差距何等严重。非熟练劳动力非常丰富，而熟练劳动力严重短缺，尤其是在医疗、工程、信息技术、金融和技术领域，主要原因在于教育部门在数学和科学上业绩不佳。南非的“人才外流”的流行只是进一步放大了这一问题，在过去二十年里南非移民至国外的专业人才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奥巴马：使用方法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而且只能从下而上解决。我曾经的设想，现在仍然没有变，是利用奥巴马促进社会变革，从教育开始。

因此，奥巴马支持教育的三个关键领域：资源分配、教学与学习实践，以及绩效评估。教师们可以使用丰富的媒体内容工具创建、共享和访问教育资源，而新一代Web即Web2.0丰富的界面（如Ajax技术）通过博客和社会媒体为教师、学生、家长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和合作创造了便利条件。该系统还包含持续衡量学生表现的测评应用软件。

我一直在努力免费为学校提供奥巴马。为什么？我希望有一天，通过奥巴马，每一个孩子都能获得优质教育，不管他的家庭经济条件如何。奥巴马的费用目前得到私人资金的资助，而且我很幸运地获得了宝贵支持：南非最大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互联网解决方案公司为我主机提供了免费托管。我还与现有的教育部门非政府组织合作，如为贫困社区提供信息通信技术培训

的Edunova，和建立了高品质教育资源的Siyavula。

面临的挑战

不过，我也很清楚自己面对的各种挑战。除了我和我丈夫（他现在和我一起工作）为了我们自己的事业所作出的个人牺牲以外，奥巴马还面临着外部因素带来的重大挑战。正是从奥巴马获益最多的这个市场缺乏基础设施和互联网连接。据南非基础教育数据部称，2009年，南非的25000所公立学校中只有23%拥有计算机中心，据估计，目前只有不到20%的公立学校连接到互联网。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南非的2000所私立学校从成立起几乎全部设有联网的计算机设施。因此，奥巴马的目标首先确定为私立学校。我的策略是：先赢得国内外一些数量不多但高度联网的学校，然后利用其竞争优势（即熟练的教师、优质教育资源等等）这个杠杆，最终使所有学校受益。目前，处于劣势的一些学校已经能够快速、经济有效地访问其他学校通过这个平台创建的优质教育资源。

但是，尽管奥巴马已进入大部分联网学校，它依然有其困难。学校还未能如社交、商务和小众社区那样欢迎Web2.0互联网模式的革命，可能是因为网络安全问题——关于未知领域，学校决策者有责任做一个把关者。我花了不少时间说服他们，使他们确信奥巴马的社会学习意义，及其提供一个安全环境的承诺。现在，已有40多个学校注册了奥巴马，该产品自己证明了其安全性，事情变得比以前容易。

至于网络连接问题，非洲大陆正在发生变化。SEACOM、Main One、EASSy以及WACS，所有这些都把非洲与信息高速公路连接起来的海底光缆系统的铺设，是为了实

现非洲互联网网速的成倍提高，和上网费用的降低。目前，移动服务是非洲占主导地位的互联网接入介质，并将持续这一地位——这是一个巨大的发展中消费市场。但对于学校来说，（由于云计算服务的增加而引起的）硬件成本下降将提供一个机会，使得建立技术中心和消除数字信息系统（和教育上）的差距真正成为可能。

2011年，奥巴马被法国Netexplorateur公司连同教科文组织、法航、德勤、Orange和其他若干机构评为2011年全球十大最具创意的技术之一。我很荣幸地被南非的一家报纸《邮卫报》评为2010年“你最愿意共进午餐的前200名青年”之一。奥巴马无论获得何种认可，都是一种荣幸——尽管前路漫漫。奥巴马到达的每一个里程碑，都会有助于其上下求索，提高教育质量，帮助整个非洲大陆更多的学校与非洲以外的世界联网。■

↓ 巴巴哈·马琳松，今年30岁，设计了为南非学校服务的社会网络奥巴马。



赛尔日·阿米斯的

《JR眼中的拉基·李》。JR友情赠送《一代人的肖像》系列中的这张照片复印，专门给本篇采访稿配图。

赛尔日·阿米斯接受
塞伦·德米尔的采访

那是1997年。一个小男孩和他的兄弟们一起在田里干活。一些武装人员突然出现。他的哥哥们比他跑得快。他被带走了。他们给他穿上军装，让他吸大麻烟；他们给了他一支枪，并命令他射击。他服从了命令，好像在玩一场战争游戏……他的名字叫赛尔日·阿米斯。今天，他是一个25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不知道自己确切出生在哪一年。2001年洛朗-德西雷·卡比拉死后，赛尔日退伍了，却感到茫然若失。他难以适应回归平民的生活，但幸运的是，他发现自己有成为艺术家的才华。他终于能够再次找到内心的自由。他开始了新生活。今天，赛尔日希望帮助全世界20万至30万的儿童士兵，使他们同样能够开始新生活。他与他的木偶们跳舞，他进行雕塑和写作——为了自己，为了儿童兵，为了我们大家。

你被带走，并被迫加入洛朗-德西雷·卡比拉的军队的时候，连十岁都不到。一直到2001年，你的身份是儿童士兵。你怎么回顾这段时期？

我现在对战争的看法与那时的看法完全不同。当我被带走的时候，我很害怕。我们被迫与家人分离。我很快就明白，他们不会再让我们回到亲人身边。虽然我们还是孩子，他们要求我们为国家贡献自己的生命。我慢慢习惯了军队的节奏，习惯了那里的人和生活。

我们不懂什么政治。他们只是教我们战斗和服从命令。我们成了士兵。我们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大家庭，挺开心的。

《神奇武器》是马提尼克诗人艾梅·塞泽尔（1913年-2008年）的一部诗集名。

神奇武器

你们很开心！你们不怕死吗？

我们知道我们会死，但有时我们以为只有那些快死的人才会死亡，我们是不会死的。我们抽大麻，把自己当作施瓦辛格电影里的演员，仿佛死亡不是真的。我们是军队里的明星，因为大人们觉得儿童兵非常有趣。

但是，我们失去了玩耍的能力。他们付我工资，但除了可能买一些玩具士兵，我没有什么地方可花钱。当战争又一次打响，我会又穿上军装，准备好去玩真正的战斗。

我变得没羞没臊、天不怕地不怕。如今的我不能像这样生活。当我回想军队里的自己，就好像从外面往里面看。我认不出自己，因为我现在已经不一样。

当时你们有梦想吗，或者说你们根本就不让自己梦想？

我们没有时间去想。我们没有想过将来。我们甚至不认为我们有一天可以长大。我们在那里是为了打仗，仅此而已。

你怎么看待强迫你去打仗、至今依然对其他孩子做同样事情的士兵？

我们当时以为是在帮助国家。我们是卡比拉总统的仰慕者，他就像我们的父亲，我们很喜欢他。我们没有特别责怪那些士兵，因为他们给了我们一种儿童面对大人时通常不会拥有的权力。我们总是相互竞争，看看谁是最强的。平民世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未知世界。我们有权力，为什么要放弃这种权力？

我现在对政治的了解不足以让我理解为什么会发生战争，为什么

这些士兵把我们掠走。但我知道，如果你爱你的国家，你必须保护儿童。如果一个国家儿童的时间都在军队度过，谁会使这个国家摆脱战争？我没有对那些士兵生气，但我并不赞同他们的做法。最主要的，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今天，你明白你是被人操纵了。你认为你已经摆脱这种军事程序化了吗？

我发现很难回归平民生活。我在2001年退伍，成为一名平民。但我仍然像一名战士一样思考。感谢玛索罗空间[艺术家和手工艺人的一个资源中心，2003年建立于金沙萨，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由刚果艺术家马尔文·维娄、休伯特·马赫拉和伦贝尔·牟赛卡成立]，我学会了如何与其他人更好地相处。那是我发现艺术、找回自由和独立的地方。

在战争中，你是一个深受赞赏的音乐艺人。歌唱对你经受当时的情况有无帮助？

有，我喜欢歌唱，也喜欢让人开怀大笑。在参军以前，我的哥哥们常唱歌、讲故事给我听。在军队里，一些士兵想念他们的孩子。他们常常叫我去给他们唱歌解闷。我稚嫩的声音和孩子的个头使他们发笑。我就像是一个完全依靠自己的小小明星，这引起了别的一些儿童兵的嫉妒。我喜欢表演，能够想象自己成为一个艺术家。

你现在使用什么样的艺术表现形式？

我是个舞蹈演员、木偶艺人和雕塑家。我有一个想法，是创建一个结合这三种艺术表现形式的单人表演项目。另外，我与我的朋友雅

“人们说我们是战火童兵、儿童士兵，但我们不过是处于战争中的儿童。我并不想涉入战争，我被迫携带枪支，我再没能与我的父母或家人团聚，我所有的只是军队和我的武器，他们告诉我，武器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赛尔日·阿米斯，《勿忘我，明天的孩子》，异域风出版社，2010年

↓ 《刚果，我的身体》剧景，2010年，法国巴黎维莱特公园。



旺得·穆朗巴合作上演了一出戏《刚果，我的身体》。我参军之前就认识雅旺得，他和我一起当过儿童兵。过去几年里，我们在欧洲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些地方进行了表演。我仍然无法靠艺术挣到足够的钱，但我希望找到一个可以让我工作的工作室。我也举办其它项目，但仅以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一名前儿童兵的身份。我还与莫桑比克和德国的青年团体有联系。

你刚开始成为艺术家的时候，在别人面前表演是什么感觉？你害怕吗？

我害怕我的表演会糟到让观众目瞪口呆而应付不下去。我甚至担心会受到威胁和审判。我在2008年底来到法国以后，突然发现自己的过去是如此令人厌恶，我开始对此进行反思。我有个印象，我在脑海里重温了过去的一切。现在我觉得心里平静了一些，不再过多回想过去，让自己能够继续前进。如果可以重来，我不会去加入战争。我尽量不感到内疚，我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的错，我是被逼的，他们用迷药控制了我。在几个朋友的大力支持下，我远离了那一切。有一天，有人给了我一些练习簿，我开始写我的故事，只是为了我自己。

今年三月，你的书《勿忘我，明天的孩子》，在法国由异域风出版社出版。你想要传递什么样的信息给今天的青年？

我出版这本书[该书用他在2004年至2008年间，以林加拉语在练习簿里写的笔记编著而成]，是为了留下一个记录，告诉人们发生过什么，并向青年们展示我在孩童时期的经历，以及其他曾经经历或者在某些地方正在经历的事。这可能会对他们有用。■



© UNESCO/Danica Bijeljic

2011年4月，赛尔日·阿米斯在《教科文组织信使》办公室接受塞伦·德米尔的采访。塞伦·德米尔，法国—土耳其学生，18岁，现就读于（法国）巴黎第四大学。这是她第一次为大众媒体出版物做采访。

陷入暴力循环

全世界约有2800万儿童由于武装冲突而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说：“武装冲突仍然是世界许多地区人类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但其对教育的影响被普遍忽视。”战争摧毁的不仅是学校和教育基础设施，而且还有几代人的希望和雄心。

2011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潜在危机：武装冲突与教育》中指出，问题不仅是冲突本身，还有冲突引起的其它问题。孩子们辍学，或者他们的父母禁止他们去上学，因为校园内外的孩子们和教师们不断受到威胁。孩子们遭遇了恐吓、强奸和绑架。许多被绑架的儿童被带到武装部队进行战斗。如果他们想活下去，再次见到自己的家人，他们不得不服从、杀人。强奸常被用作一种战争手段，在某些国家，目标特别瞄准了不设防的青少年。

“我从河里打水正在回家路上……”15岁的米诺瓦（她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南基伏人）说，“两个士兵走过来告诉我说，如果不和他们睡觉，他们就杀了我。他们打我，撕我的衣服。其中一名士兵强奸了我。[.....]我的父母找一名指挥官理论，那个指挥官说，他的士兵不会做出强奸这种事，是我在撒谎。”（《人权观察》，2009）。

武装冲突对教育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而失败的教育会助长冲突这一点却不那么明显。然而，一个教育系统，如果不能为青少年提供避免失业和贫困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必要的工具来学习“和谐共存”和尊重他人，会成为一个仇恨和不和的地下源泉。■

米拉·卓列娃，22岁，保加利亚学生，教科文组织新闻司实习生

21岁的诗人、说唱歌手和散文家奈特·马歇尔在美国芝加哥“比炸弹更大声”诗歌节上朗诵他的诗。
© LTab



当诗歌 比炸弹更大声

在上辈人意味着种族隔离的地方成立社区，在幻灯光下鼓励艺术天分和青年发言，填补误解沉默……。这些是“比炸弹更大声”诗歌节的几个成功之处。十年来，该诗歌节聚集了芝加哥的未来诗人。

奈特·马歇尔

确切说来这并不是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事件。更准确地说，它可以被描述为一个社区。但也许，它最好的定义是精神。由于这一精神，每年暮冬时节近三个星期的时间里，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学生、诗人和观众们从芝加哥各个地区来这里逗留。这就是美国的“比炸弹更大声”芝加哥青年诗歌节。

“比炸弹更大声”诗歌节始于2001年，当时是8所高中的即兴诗歌赛，至于创始地点，联合创始人凯文·科瓦尔只能用“老鼠出没的地下室”来形容。当我13岁开始参加“比炸弹更大声”的竞赛时，参赛队伍已发展到15

个（我所在的队伍是唯一的初中代表队）。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周末我参加开幕活动，看到的那个场景改变了我的生活。在昏暗的房间里，我看到各种肤色的青少年聚集在一起为自己而庆祝。空气中弥漫着免费比萨饼的气味和嘻哈音乐的节拍，我被房间里的能量吸引入迷。

现场最吸引我的是在背景处围了一大圈的学生，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我靠近人群，在圈外听到了年轻人的押韵的声音。他们不仅仅是在背诵诗歌，他们还在自发地创作说唱、歌曲和吟唱。我对这种自由式解密活动观察了几分钟，这个圈子的绝对民主使

我感到震惊。每个想要参与押韵的人都会得到一个机会。技艺是判断每个人的唯一的衡量标准。

“比炸弹更大声”诗歌节中最著名的活动仍然是即兴诗歌赛。即兴诗歌赛是一种奥运风格的诗歌竞赛，作者在没有音乐和道具的条件下展示其原创作品。从本质上来说，即兴诗歌赛的裁判极其主观，“比炸弹更大声”诗歌节上有一个说法是，最好的诗人从来赢不了。即兴诗歌赛的秘密是它就是一个噱头，虽然对社区以外的很多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特别冤枉的说法。即兴诗歌赛使用竞赛的诡计来提升艺术的知名度和放大青年的声音。

诗歌对抗种族隔离

这项工作在任何地方举行都是好的，但在芝加哥城，它不可缺少。因为芝加哥是一个有着明显种族隔离现象的城市。这个城市一度被金博士称为“北方种族主义最严重的城市”，但这里仍有一种文化罕见地吸引了来自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们，使他们聚集到了同一个房间。参加“比炸弹更大声”诗歌节的人口是如此奇怪，因为它违抗了芝加哥由来已久的朝单一人口方向发展的趋势。“比炸弹更大声”每年使得来自各类不同背景的学生们聚集、倾听、感悟自身并互相学习，这是一项重要工作。

听到来自芝加哥西侧的“麻烦高中”奥尔高中的学生库什·汤普森充满热情的谈论一个“美泰品牌”社会所传播的不公平的女性身体形象，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看到来自驰名磁性学校和富裕郊区学校的学生们认同她的观点，并一起分享同一个舞台，这是一件更了不起的事情。学生们之间的这种共性的发现将创造出一种新的城市文化。

尽管在过去几年里芝加哥发生了大量的青年暴力事件，“比炸弹更大声”诗歌节令人惊讶地一直保持了安全记录。诗歌节在其十年的经营过程中从来没有经历过暴力事件，虽然组织者吸引来的参赛学生跨越了无形而确实存在的分界线，来自不同街区以及帮派领域。尽管竞争越来越激烈，现在包括超过70支参赛团队和30位个人参赛者，“比炸弹更大声”诗歌节的社区精神依然不变。解密仍然是诗歌节上最常见的现象之一，经常会看到参赛队伍在一回合结束以后，在一家当地炸鸡餐厅交换笔记和谈笑。

迅速传播

2007年，两位美国电影制片人格雷格·雅各布和乔恩·希斯科尔注意到了这一精神。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们全程跟随了3位个人参赛者和1支参赛团队为诗歌节做准

© Siskeel/Jacobs Productions 友情授权



↑ “比炸弹更大声”电影一幕。

“如果5月份的第一周你不在这里，那你就没来最好的地方。‘比炸弹更大声’诗歌节是这个星球上最酷的地方。”

—— 亚当·戈特利布，2005年-2008年参赛者

备的整个过程。我很幸运地成为其中之一。从数百小时的镜头中，他们制作了一部纪录片，一窥那几个学生的生活，以及即兴诗歌赛对于参加的青年们来说是怎样的一次改变生活的经验。

该纪录片已经获得《综艺杂志》、《洛杉矶时报》等媒体的积极评价，并引起了评论员罗杰·埃伯特（美国最著名的评论员之一）的注意。《比炸弹更大声》入选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各大电影节，并赢得了许多奖项，其中包括棕榈泉电影节、芝加哥电影节和奥斯汀电影节。这部影片将在2011年秋季奥普拉·温弗瑞有线电视网播出，作为她“本月纪录片”俱乐部的一部分。该影片甚至启发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举办了分支活动。2011年4月，我与凯文·科瓦尔一起去了塔尔萨，帮助他们组织第一届塔尔萨“比炸弹更大声”诗歌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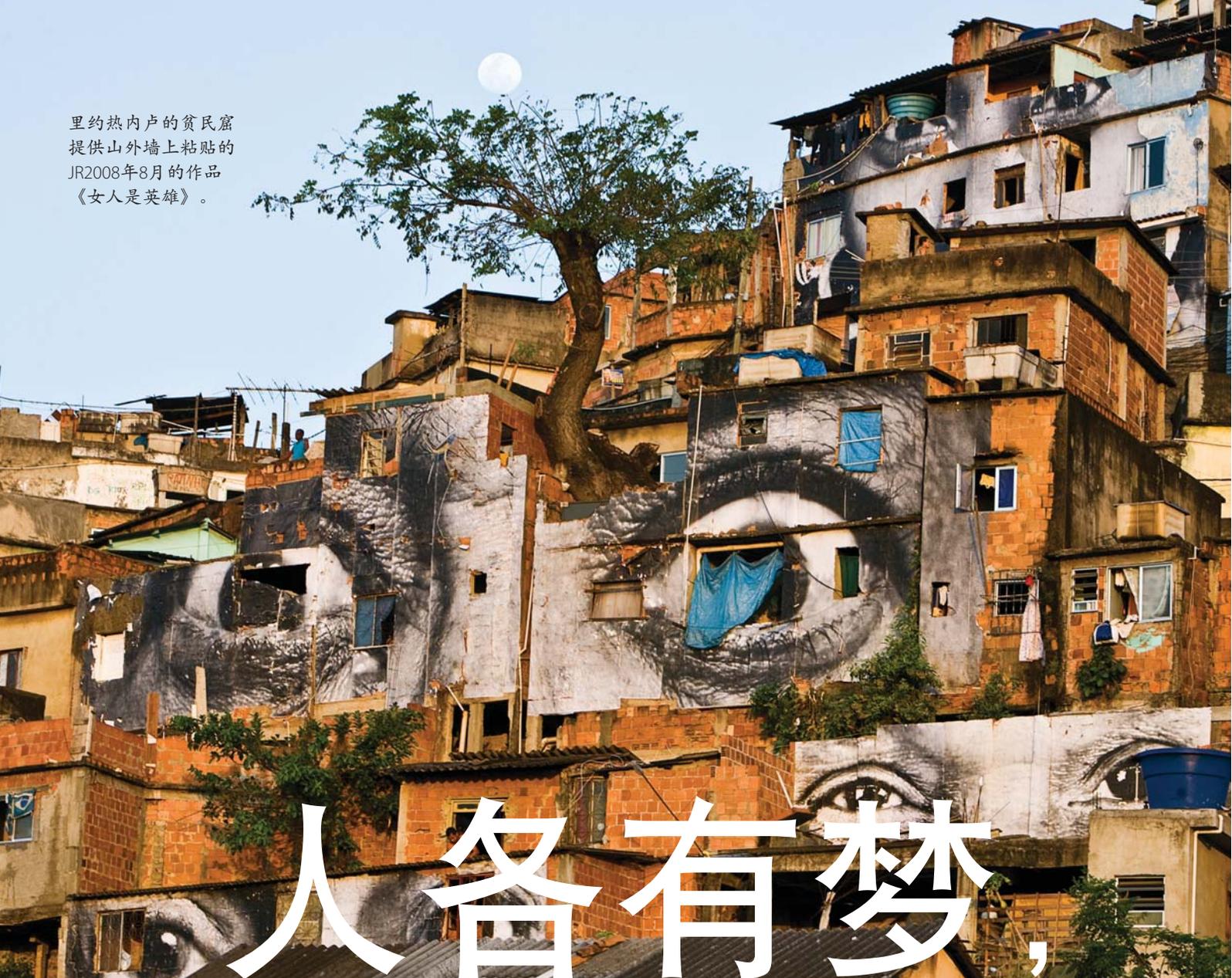
2009年“比炸弹更大声”诗歌节全明星埃里卡·迪克森因为诗歌节能够“建立社区，使我们彼此联络并接触专业艺术家”而喜爱这一平台。两届“比炸弹更大声”诗歌

节全明星西德妮·爱德华兹说：“对我来说，‘比炸弹更大声’是我结识芝加哥各地同龄人以及锻炼我的技艺的场所。”这些学生是即兴诗歌赛的一些冠军，代表了将把文学艺术作为事业的一小部分参赛学生。对其他更多的学生来说，他们将从事其它职业，但这完全没有问题。“比炸弹更大声”的首要成功是促进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通过赋予他们使用语言并倾听对方的机会，“比炸弹更大声”使得学生们分析和挑战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的不公和缺点。2011年印地即兴诗歌赛冠军马尔科姆·伦敦，谈及诗歌节的工作时说：“这在‘比炸弹更大声’不会停止。”在他们的父辈种族分离存在的地方，这些学生建起了社区。他们用交响乐般的故事填补了误解的危险沉默。

“比炸弹更大声”的力量在于那种故事的感觉和那种想象力，学生用它们来告诉乐意聆听的观众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并赋予他们建立梦想世界的机会。■

奈特·马歇尔，21岁，是一位诗人、说唱歌手和散文家。他是获奖的长篇纪录片《比炸弹更大声》中的明星，是2010年文学情结协会格温多琳·布鲁克斯公开话筒奖入围者。他的作品出现在多份诗集中，他现在是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本科生，学习英语和非裔美国人研究。

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
提供山外墙上粘贴的
JR2008年8月的作品
《女人是英雄》。



人各有梦，

但..... 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从事不同的职业，讲着不同的语言，但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年轻、艺术、希望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建立联系。直到最近，他们才相互认识：教科文组织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赋予他们“促进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跨文化对话的青年艺术家”称号。其中，贝蒂·夏米尔（美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地区）、梅林·特瓦夫侯芬（荷兰）、“达人2008”乐队的两名代表布莱特兰德（挪威）和沙欣（巴勒斯坦被占领地区）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他们向读者讲述了他们的信念、计划和梦想。

以下是艾丽思·朱莉娅·比由勒、卡来德·阿布·黑杰的采访稿

艺术家怎样才能帮助实现和平及全世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夏米尔：艺术家照亮我们共同的人性。戏剧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人是多么相似。这里的人不仅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而且还指世代更替中的人们。它不仅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如何和平共处，而且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当人们看艺术作品，尤其是戏剧作品，如在今天仍能引起我们共鸣的古希腊时期创作的戏剧，人们会明白人的本质只有一种，可以识别，却无法定义。

布莱特兰德：我认为，音乐是心灵的语言，即使我们不使用同一种语言，我们可以通过音乐交流。世界有时显得很暴力，所以大家能走到一起演奏音乐是很好的事，音乐是我们的热情所在。音乐是让我们暂时脱离世俗世界的一个自由空间。

沙欣：音乐是跨国的语言。音乐让别人明白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你对生活的感受。

特瓦夫侯芬：在我的项目中，我通常避免使用“和平”一词，因为围绕“和平”一词有很多期望，也有令人失望甚至沮丧的时刻。但是，让我们反思一下，什么是和平的条件。在我看来，和平的一个条件是人與人之间的接触。因此，我想刺激这种接触，引起人们的好奇心。艺术是引起人们好奇心的一种极好的方式，它不给出答案，而是创造开放的思路。当某一事物是开放的，不完全固定的，人们会想要继续探索，因为他们想要了解更多信息，从而找出真相。我相信这可以成为和平与谅解之路的一个条件。当我离开一个地方，常给那里的人们留下很多思考的问题，对此我感到很高兴。

艺术家应该有时出错的自由。

——夏米尔

你们在项目中曾遇到过怎样的困难？你们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

夏米尔：处理挑战性问题时会遇到的一个困难是，你需要能够不把自己的观点完全表达出来。有时候艺术家们会避免争议性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必须有答案，或者说他们必须能够用一种无可挑剔的方式表述。我认为，艺术家应该有不时出错的自由。

另一个我经常面临的困难是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知道我的政治主张。我的梦想是有一天中东像欧盟一样联合起来。当然，大多数人马上会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提醒他们欧洲百年前的情形——在上个世纪，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各国互相占领，互相分裂。我要挑战这样的信念，即我们中东的局面是无法改变的这一信念。

布莱特兰德：我的唯一问题是语言。来自埃及和巴勒斯坦的一些艺术家英语说得不是很好，这使我们走到一起做音乐的时候有点难，因为你无法用语言进行沟通。但是，我们至少有音乐，并且我们一起演奏了！

沙欣：我没有语言问题，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合作也不成问题。我的困难在音乐方面，我是一个打击乐手，对我来说挪威歌曲难以演奏，因为其节拍与我通常演奏的东方音乐节拍完全不同。但是，这是一次很好的经历！

特瓦夫侯芬：我工作的困难是，当你想要做一点不同常规的事，试图说服别人与你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人们心目中的想法常和你不同。例如，在塞浦路斯，我谈了很多关于该岛的统一和用音乐联系双方的观点，人们不知道我想要做什么，我的政治企图是什么……。所以最后我放弃了所有的理论，对自己说：好了，去演奏音乐吧，听听对方说的话。结果，一下子什么都变清楚了。在我的道路上，因为搞得过于复杂和期望他人有同样的梦

想，我犯过许多错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梦想，但一旦你开始行动，人们就会得到启发，感觉到这种联系。

你们如何定义自己作为艺术家在国家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夏米尔：我认为，在任何社会中艺术家的作用都是启发。我希望能启发我生活的国家的人民，即美国人民，使他们拥有真正成为世界公民的愿望，一种愿意去了解其他文化，看到不同观点的愿望。

当你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显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也是非常重要的。举例来说，西方艺术家关于中东的作品着重关注妇女的困境。我住在美国，而那里的妇女也没有多少政治、经济和艺术权力。因此，我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我需要做的其中一件事是讨论在全球范围内妇女的处境是如何的相似，因为人们很容易看到其他文化的不足，但有时却看不到自己文化的短处。由于我生活在两个世界，这使我能够从根本上质问不同的文化真正是怎样的。

沙欣：我的国家，巴勒斯坦，有许多消息和梦想希望和全世界分享。我认为，通过我的音乐我能做到这一点。当然，巴勒斯坦对内和对外发送的消息不同。对外，我们要澄清很多关于我国的事情；对内，我们必须支持人民。对此举的反应也相当不同，但我能为向世界展示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自豪。

布莱特兰德：在外面我们听说的巴勒斯坦都与战争有关，因此当我们看到，那里也有音乐，人们在巴勒斯坦过着他们的生活，我们觉得很好。作为一个挪威民间音乐家，我认为，重要的是有年轻一代继承挪威民间音乐的传统，因为我们必须保证民间音乐得以传承。

特瓦夫侯芬：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希望搅乱并打破表面。人们有一种强烈的需求，希望把周围的世界分

门别类打理清楚，贴上标签。之后很难再改变他们的想法。因此，我相信我们需要混乱，让人们认识到标签并不总是适合，并开始寻找标签背后的东西。

我能够到世界各地去，去了解让我感到好奇的这些地方，这是一种荣幸，但同样重要的是我可以让别人跟随我的脚步。如果我到叙利亚旅行，这对我来说是一次美好的经历，我会通过我的项目找到方法使西方世界的人们也能感受到叙利亚的风情。我觉得我必须分享这种好奇心，这不仅是为了我自己。

我在荷兰遇到很多只专注于音乐品质的艺术家，但他们之中大多数人不问自己是否可以将品质作为一种工具，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由于教科文组织，我遇到了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他们不仅关注艺术，而且也考虑现实世界中的艺术，以及艺术能改变什么。

在获得教科文组织的荣誉称号之后，各位对不久的将来有什么计划？

特瓦夫侯芬：这一认可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的作品通常在音乐厅、节日、管弦乐团节目以外的地方演奏。我自己创作作品，通常与一个小型组织或自由职业者合作，几乎没有任何预算。有时我得到媒体的关注，这是重要的，但因为我的作品不在文化基础设施范围之内，很难归类，因此很难得到支持和合作伙伴。这样的称号阐明了这样的事实：我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获得了一些积极的结果。我也希望在未来几年，我可以跟进已经开始的项目——例如，东耶路撒冷的圣城地下音乐节。我迄今所做的只是一个开始！

夏米尔：这个称号是对我来说意义非常。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我的巴勒斯坦身份和美国身份都得到了承认，因此，教科文组织已经承认了身份的复杂性。除了在艺术上继续发展，我愿意支持已故的朱利亚诺·麦·哈麦斯（以色列演

教科文组织青年艺术家

今年4月，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授予一些35岁以下的艺术家“促进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跨文化对话的青年艺术家”称号。这一荣誉认可了这些青年艺术家在推动阿拉伯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获奖者是：

鲁缙·西拉和玛雅安·埃米尔（以色列），艺术家和美术馆长，他们设计了“治外法权区域”项目，通过这种方式把生活在冲突地区，尤其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地区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

西迪·拉比·卓卡维尔（比利时/摩洛哥），舞蹈家兼编舞家，他编排的舞蹈表演表达了文化的碰撞和身份的探索。

费德里科·费隆（意大利），电影制片人，他制作了数部影片，反映移民主题、郊区主题和移民社区对一个国家文化的贡献。

法伊莎·贵尼（法国/阿尔及利亚），小说家，其备受赞誉的著作描绘了生活在法国郊区的北非裔侨民的现实生活，并对陈词滥调和偏见进行了反驳。

JR（法国），摄影师，“面对面”项目的幕后灵魂人物，该项目在隔离墙两侧张贴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各种照片。

易卜拉欣·马娄夫（黎巴嫩），小号手，他的音乐融合了东西方的音乐风格，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合作。

马萨尔·艾格巴里乐队（埃及），推出了“以音乐为桥梁，进行文化间对话”项目，邀请西方艺术家分享音乐会的舞台。

贝蒂·夏米尔（美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地区），剧作家，她所著剧本强调文化间的关系，特别是阿拉伯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关系。

祖哈尔·苏丹（伊拉克），钢琴家，他在年仅17岁时成立了伊拉克国家青年管弦乐团，该乐团与数位西方艺术家合作。

“达人2008”乐队汇集了九位演奏欧洲和阿拉伯传统音乐的青年音乐家（分别来自巴勒斯坦被占领地区、埃及和挪威）。

梅林·特瓦夫侯芬（荷兰），作曲家和音乐家，他在约旦、巴勒斯坦被占领地区、叙利亚和荷兰等地已开展一些特别项目，用音乐来建立心灵的连接，把音乐作为和平的象征。

↓ 授予“促进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跨文化对话的青年艺术家”称号时的集体照，2011年4月13日。



© UNESCO/Michel Ravasard





2007年JR和马可的“面对面”项目中，
一个伊斯兰教阿訇、一个天主教神甫、
一个犹太教教士接受“友情”游戏。
“面对面”项目在很多墙上张贴了在以
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从事同样工作的以
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肖像。

员、自由剧院院长，2011年4月4日被谋杀)所做的努力，他在杰宁做了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们不应因畏惧暴力而退却，我们必须继续做好工作，立志为实现大家所向往的未来而努力。

布莱特兰德：我非常乐意访问其它国家，了解他们的民间音乐。我认为，传统音乐是一种了解其他文化的特别好的方式，甚至比现在流传更广泛的古典音乐还要好。此外，因为我们的“达人”项目在埃及和挪威都已举办过活动，如果可以访问巴勒斯坦并在那里举行音乐会，那就太好了！

沙欣：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将继续沿着作为一名巴勒斯坦民间音乐家的发展道路前进。教科文组织的称号鼓励并推动我在音乐生涯上更进一步。有人能理解和欣赏我的艺术真是太好了。当我遇到其他获得这一称号的艺术家们，看到他们的项目，我很惊讶——我发现我们并不孤单！ ■

艾丽思·朱莉娅·比由勒，29岁，研究德国艺术史、比较文学。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提供山台阶上，JR粘贴了2008年8月《女人是英雄》项目中的女人肖像。



JR, 艺术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JR，即本文插图照片的摄影师，是教科文组织青年艺术家团体的一个成员。这位28岁的法国“城市艺术活动家”声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画廊——街道！

2001年，JR开始在巴黎的建筑物外墙上暗暗粘贴他拍的快照复印件，照片内容是他的朋友们在屋顶上涂鸦的情形。他镜头下的主题很快变得更多元化，而图像则变得越来越巨大，2004年他的“一代人的肖像”达到了6米×8米，该项目让他出了名。那一年，他还在纽约、洛杉矶、巴黎的街道和蒙费梅伊——巴黎的一个贫困郊区的社会公共住房区博斯凯之城做了展览。

2007年3月，他和马可举办了“面对面”——“有史以来最大的摄影展”。他们并非张贴了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几个城镇从事同样工作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巨型肖像。“‘面对面’表明，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其实是可能的，甚至很简单”，他在2011年3月2日长滩（美国）科技、娱乐、设计大奖颁奖典礼上说（www.tedprize.org）。

2008年和2009年，他的“女人是英雄”项目把他带到了肯尼亚、巴西、印度和柬埔寨。2011年春天，作为“里面朝外”项目的一部分，他匆忙赶到突尼斯用照片贴满了警局和政党总部的外墙。10年来，他实现了我们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他让这一切显得如此简单！

- 雅斯米娜·萨波瓦

JR的网站请见：www.jr-art.net

**《作为艺术家，我想
散布混淆、打破表象。》**

——特瓦夫候芬

帕特莫尼托 在多哥



帕特莫尼托，代表世界遗产青年守护者的卡通人物形象，诞生于1995年。他是世界遗产志愿人员的吉祥物，他带领青少年伙伴们去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和欧洲的世界遗产。在世界遗产中心和国际志愿服务协调委员会的监督下，青年志愿者们参与到保护和欣赏标志性世界遗产的事业中。

卡捷琳娜·马可洛娃

假如多哥的百年塔塔泥屋有手臂，它们会伸出双臂拥抱这些年轻人，就像祖母拥抱自己的孙辈。在过去的四年里，来自多哥、法国、瑞典、日本和韩国的志愿者们汇集在古帕玛库这个位于多哥东北部的世界遗产地，精心维护着这些脆弱的“老太太”们。

塔塔——传统泥制塔屋——俨然是巴塔马利巴人所有智慧的体现。但在现代化方便快捷的建筑规范的重压下，它们正逐渐崩溃。大自然也不帮忙，八九月份的雨季过后，留下的是一片狼藉，房屋倒塌，令人悲叹。甚至树皮可用做粉刷塔塔墙壁涂料的球花豆树也越来越少了。

青年志愿者们决定的入手之处正是这种球花豆树。这种树具有象征意义的名字在班巴拉语中是“好”的意思，它的根为了找到水源有时可深达地下60米，它为人们提供满树的营养丰富的水果。正如球

花豆树一样，这些青年也找到了问题的源头。有什么方法能比种一棵不仅能为村民提供食物，而且还能为塔塔提供防水材料的树更好？

这些世界遗产青年志愿者们，由多哥的非政府组织“农民与手工业者发展兄弟会”牵头，在帕特莫尼托和国际志愿服务协调委员会的支持下，已经确定并种植了建造塔塔塔所需的各种濒危植物。两年内，他们在该遗产地2000平方米的一片区域里种植了1050棵新树。这是第一步，为用传统方法恢复塔塔泥屋提供了必要的材料。

但是，除了坦伯马文化——巴塔马利巴的另一个名字——的有形遗产以外，志愿者们还想要帮助保护它的无形遗产，他们在2011年3月26日至30日期间参与了第一届坦伯马文化节的筹备。23岁的多哥男子阿提·Y·塔塔经营着一座度假营，今年住了七名志愿者。他解释说：“今年是坦伯马文化节举办的第一年。我们对能参与这项新倡议的实施感到非常兴奋，这展示了我

们丰富的本土文化、语言、工艺品和农产品。”这些珍宝，与塔塔泥屋一起，使多哥成为了西非文化旅游中不容错过的一站。“对于不了解这种文化的人来说，比如我就是这种情况，这个节日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在短短一周内让人们得以沉浸其中。”24岁的瑞典志愿者琳达·古斯塔夫森娜充满热情地说，“我真的希望它会继续下去，因为这也给坦伯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得人们能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欣赏古帕玛库遗址的财富。”

青年志愿者们基地在阿德塔，距离古帕玛库400公里的行程没有令他们却步。没有可自由支配的车辆，他们就竭尽所能克服困难，“我们坐出租车、公交车或者摩托车，视道路状况而定。”阿提说。事实上，该项目还是有点难以为继的感觉，“我们本来应该帮着为文化节做准备，但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可做的了。”琳达说。尽管需要一定时间才能造成声势，这种去探索，以及就这么参与其中的意志弥足珍贵。■

↓ 阿提·Y·塔塔在古帕玛库（多哥）。



创造力的奇迹

青年志愿服务可以实现的真是太多了。为青少年提供榜样，以新的前景激励他们，他们的创造力会产生利息。以认真的态度对待青少年，赋予他们基于信任的责任和在社会中的地位，他们会变得出类拔萃。

志愿服务给青年行动、改变身边世界的权利。2010年，联合国志愿服务计划接纳了来自158个国家

的约8千名志愿者，在132个国家展开工作。它的网上志愿服务项目也动员了1万多其他志愿者，为发展做出贡献。约62%的志愿者来自发展中国家，80%为18到35岁的青年。

2011年标志着国际志愿者年十周年。也是欧洲志愿服务年——青少年们因而有了行使自己的权利、参与社会活动的又一理由。■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网站：<http://www.unv.org>

↓ 肯尼亚第13届国际童军大会开幕式，2010年7月27日。



©WSB Inc./Victor Ortega

构建公民身份。这就是我为自己在联合国做志愿者的经历所下的定义。我最近参加了由联合国秘书长发起的“联合起来制止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运动。我帮着在数个社交网络上发起了讨论，使玻利维亚人加深对这一严重问题的认识。我从最近这6个月的经验得到的一个认识是——青年志愿者们尽

心尽力，非常专业。我们是一群渴望学习、渴望帮助建立社会公正的青年专业人员。

要发挥青少年们的理想主义和动力，志愿服务最合适不过。尽管我们看起来不老成，因年轻而造成的经验不足其实是一个容易克服的障碍。通过志愿服务参与社会活动，

肯尼亚童子军成员约瑟法·吉通迦对社区服务非常重视。他几乎把它作为一种“神圣职责”来对待，这为他赢得了肯尼亚童军协会的广泛好评，以及在他的家乡，位于内罗毕东北约120公里处的恩布镇的童军中心主任一职。约瑟法是个激情洋溢、勤奋工作的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项职责中，200%地完成了目标任务！他在挪威同行的支持下，通过办旅行社和餐厅微型项目，成功把中心向社区开放，不但创造了就业机会，还达到了财政基本自给自足。

最初，该中心计划只是举办偶尔的童军活动。但约瑟法的梦想是把恩布变成一个地球村。国际童军大会——为童子军中年纪最大的团队，即年龄18至25岁的童子军而组织的会议——从未在非洲举办过。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约瑟法在童子军中名声远扬，甚至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童军都知道他，他凭借这一经验，很快说服了肯尼亚童军协会提名恩布镇为第13届国际童军大会（2010年7月27日至8月7日）在肯尼亚的三个地点之一。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1000多名年轻的世界公民抵达了恩布，这个小镇因为这么多的友谊、欢笑和兄弟情谊，以及关于当今世界主要问题的热烈讨论而沸腾了。■

皮埃尔·阿劳德，瑞士学生，25岁，世界童军运动组织对外关系代表。

<http://scout.org/>

除了其社会价值，对我们青少年而言，是我们首次体验道德原则的一种方式，个人和社会的尊严建立在这些原则基础上。这种参与使我们成长为问题的解决者，促进发展的一股力量，而不是一个弱势群体。■

西尔维娅·贝隆，西班牙学生，23岁

体育：只是一个起点

当足球运动最伟大的球员们在约翰内斯堡（南非）争夺2010年世界杯的时候，来自世界各地的32支

青少年队伍为了一个更不寻常的锦标赛——2010年希望足球节——而汇聚一堂。

该节日由街头足球世界、国际足联、2010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南非组委会和约翰内斯堡市主办，持续十五天，汇集了来自弱势社区的250多个男孩和女孩。他们来自柬埔寨的小乡村、美国的大众社区、印度的贫民窟和里约热内卢的贫民区。他们克服文化障碍，通过比赛走到了一起。他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信心，返回家园不仅准备打造自己的命运，而且还准备描绘他们社区的未来。

改善弱势青年的生活是街头足球世界网络的目标。它用一种特殊的方法联合了80多个组织，来解决诸如艾滋病毒/艾滋病、犯罪及无家可归等各种社会问题。他们用足球运动把青少年纳入社会发展计划——并把他们留在发展计划中。街头足球世界与其网络及合作伙伴的工作目标是，在2015年之前，争取每年在全世界帮助2百万青少年。

足球运动可以帮助那些过于复杂、无法用常规方法解决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这场比赛仅仅是起点而已。■

街头足球世界

www.streetfootballworld.org



© Football's Hidden Stories - Peter Dench

青年奥运会

国际青年年恰逢一个新的奥运传统的诞生。2010年八月，就在联合国国际青年年开始不过几天之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奥委会）举办了青年奥运会（青奥会）的创建仪式。青年奥运会以独特的形式把15至18岁青少年的体育、教育和文化活动结合起来。在比赛中，青少年们在鼓励持久友谊的氛围里，向运动员榜样们学习，并互相学习。

.....
*在2009年10月19日，国际奥委会正式获得联合国的观察员地位。

第一届青奥会于2010年在新加坡举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约3500名青少年的参与，取得了超出期望的成果。参会者在国际奥委会和教科文组织共同主办的，于2010年12月在南非德班举行的第七届为了和平文化世界体育和教育大会上，对首届青奥会进行了评估。

与这次会议的主题“给青少年发言机会”相符，十几岁的代表们积极地参加了会议。代表们还呼吁

国际奥委会在奥运会闭会期间保持青奥会精神的活跃。

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这种精神无疑是活泼泼地欢腾着的——2012年1月第一届冬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南京正在筹备2014年的第二届青年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www.olympic.org

月光之星

非洲、失业和贫民窟这一致命的鸡尾酒无可救药地将乌干达的少女引上了出卖肉体和自我毁灭的道路。直到一群青年决定掌管这些事情。

卡罗尔·纳图昆达

从远处看，乌干达坎帕拉市的卡文佩区看起来像一片寻常的贫民窟——泥糊篱笆墙小棚屋的海洋。但是，当你走近它，你就会感觉到其它东西——疾病的恶臭和绝望到处弥漫，像死亡天使，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孩子们盯着路过的来客，眼睛里闪烁的是敬畏。但是不一会儿，他们就又撒着欢开心地到处玩了。他们在短暂的一生中，可能从来没有使用过牙膏，但那并不重要。当你踏着泥泞，继续深入贫民窟，他们的声音在远处回荡，萦绕心头。卡文佩区的特点是泥泞的贫民窟，那里的大多数人吃了上顿没下顿。

那里失业率高，家庭收入低，高度依赖那些能够赚到钱的家庭成员。贫困日益加剧，人们无力负担医疗服务。为了谋生，这里的妇女一般只有一条出路：出卖她们的身体。几年前，就是这一情况使现在30岁的詹姆斯·土莫西米留下了眼泪。当时，土莫西米作为一名应届毕业生，在坎帕拉市卡文佩区贫民窟的一家当地诊所做志愿者，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19岁的年轻母亲。“她看起来很虚弱，她说她的

孩子们总是生病。她以为是疟疾。我劝她去做艾滋病毒化验。”詹姆斯讲到这里的时候，停了下来。他停顿的时间很长，让人简直要以为采访就此结束了。“检验结果呈阳性。”他总算又继续往下说，“我感觉很难受。她哭得伤心欲绝。我建议她以积极的态度生活，但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我打她的手机号码，但找不到她……。我祈祷她没有自杀。”回顾这件事，甚至现在詹姆斯的脸色还变得很阴沉。

但是，这件事对这位年轻的心理医生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他与另外七个年轻人，发起了“破冰”项目，帮助该地区的这些弱势单亲母亲，她们之中大部分人以商业性行为为谋生。尽管，在乌干达，根据宪法，商业性行为是非法的。

项目诞生

另外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青年男子，记得当初詹姆斯和他联系时，他是一个社区工作者。他回忆说：“以前有一个慈善组织‘英国计划’做过一个项目，但只是为儿童服务。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你问那里的孩子们他们的父母是谁，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认为需要一个针对性工作者的项目，帮助他们

负起自己的责任。”另一名差不多年纪的男子讲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故事，故事中妓女们为争夺“客户”而打架。他说，有一次他的姐姐被一名妓女殴打，因为那名妓女以为他姐姐在和她抢客户。

“我记得我们开始‘破冰’项目之后的一个星期，我们每天——包括晚上——都去实地考察。我们看到，甚至夜间巡逻的警察也要求那里的女孩提供性服务，这是最可悲的。这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去做一些事情改变这一情况的想法。”詹姆斯说，“那里有许多十几岁的母亲，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她们中有些人只有13岁。其中有些是学生，有些是酒吧女招待。”

2007年，“破冰”项目启动，詹姆斯是项目协调员。“我们从曾与我们交流过的一组母亲开始，一共约10位，她们承认是性工作者。我们再请她们去找其他母亲。”詹姆斯说，“我们希望这些女孩保护自己免受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其他性病。后来我们终于培训了60位母亲成为教育者。这些母亲用自己的经验教导同伴，她们的同伴更容易听从。即使是卖淫的男人，也往往更愿意听女子而不是男子展示安全套的使用。”



© Patrick Lagès

↑ 孤独、阴影和光线，非洲某地。

到2009年，受益者人数已增长到3000名商业性工作者。这是因为那时乌干达生殖健康协会得到日本政府财政支持，成立了“月光之星”诊所，提供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其它性病的免费志愿咨询和化验服务。“我们称呼我们的客户‘月光之星’，因为我们不想用一个将他们边缘化的名字。”詹姆斯说。为了避免非受益者蜂涌而来享受免费治疗，受益者都发给了一张身份证明卡。

需要新的资助者

诊所负责人佛罗伦丝·奇斯瓦说，他们平均每周接待约70个来自卡文佩区贫民窟的客户，其中大多数人患有性病。日本政府的财政援助还被用于培训“月光之星”们学习裁缝、厨艺、手工艺和机械工作。詹姆斯说，受益者们被分为约20人一组，每一组会获得约2500美元的启动资金。大多数获得援助资金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讲。

“我现在可以照顾我的孩子，而无需从事性行业。我认为我给女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此我感到自信和快乐。”一位17岁的母亲说，她现在烤煎饼为生。另一位21岁的艾滋病毒呈阳性的母亲插话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很想死。因为我的身份，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让我留恋，让我足以面对明天的来临。但现在，我获得了治疗和安全套，还得到了一台缝纫机。我做裁缝，生意好的日子我一天能挣大概5美元。”詹姆斯说，有一些性工作者受到诱惑，有时又重返卖淫。而且，他说，他们依靠捐助资金维持运作，目前日本政府的援助已经结束。因此，“星星们”在寻找新的资助者。不过，该项目已吸引了数个合作伙伴，包括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该基金会已确认商业性工作者为传播艾滋病毒的高危人群，因此呼吁需要对这个人群付出更多的关注。“我们倾向于认为艾滋病毒在已婚人群中传播，但事实不仅如此。商业性工作

者是一个被遗忘的人群。”詹姆斯观察道。

其它伙伴是乌干达青年发展纽带——它是帮助指导和辅导街头儿童和其他年轻人的一个组织，以及乌干达生命之珠——组织乌干达妇女使用回收纸做项链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这两个组织正积极参与提高全国青年对负责任生活的认识。■

卡罗尔·纳图昆达，28岁，非洲教育发展协会颁发的2008年非洲教育新闻奖获得者。



© DR

→ 青年女子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一个社区中心学习织布。

在卡丽达·布罗希明亮的眼睛和独特的温暖笑容里，闪烁着坚定的信念。然而，谁能够想像得到，这名来自巴基斯坦西南部巴鲁基斯坦省一个保守部落社区的娇小青年女子，从她16岁第一次反对荣誉杀害这种持续了上百年的习俗开始，就一直在为改变这种陋习而努力？

诺仙·阿巴斯与
卡丽达·布罗希会面



巴鲁基斯坦的 青年舒迦

这一切都始于现年22岁的卡丽达·布罗希得知荣誉杀害习俗的那天。荣誉杀害是一名女子因被认为有给家族带来耻辱的行为，而受到男性亲属施以的谋杀或极刑。卡丽达生长于一个开明家庭，被赋予了少见的、比同龄人更多的自由，她惊讶地发现居然还有荣誉杀害这种陋习的存在。她立即发誓要反对这种令人发指的传统。由于无法采取直接反对对妇女暴力的行动，她开始写关于荣誉杀害的诗，并在她的

社区发起了激进的反对荣誉杀害的宣传活动。

但是，在一个保守的宗教社区，其基础用一句常见谚语来概括，是“女人、黄金和土地”——与男人的荣誉直接相关的三大主要财产。试图鼓动当地社区领袖把祖传习俗和宗教实践加以区分，是比卡丽达能想像到的更危险的事。

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主席I·A·拉赫曼说：“以前荣誉杀害

只发生在偏远地区，但现在在大城市，例如卡拉奇、拉合尔和白沙瓦等地，也有发生。一些定居地区也实行了这种恶习。它是巴基斯坦妇女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荣誉杀人并不总是得到报道，虽然自从2006年妇女法颁布以来，已经有一些案件开始引起当局的注意。我们只有一个大概的数字，每年大约发生800至1000起杀害事件。每年的数字可能会有略微的不同，但这是个大数目。”



© UN Photo/John Isaac

尽管存在各种挑战，卡丽达在2004年帮助建立了“参与发展倡议”组织。该组织推出了一些有创意的项目，如舒迦（舒迦是“Sughar”的音译，在当地语言中意味着有经验、有自信的女子）计划——通过使部落妇女获得经济地位而终结荣誉杀害陋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大多数遭遇荣誉杀害的妇女是那些待在家里没有经济来源的妇女。那些每月带来收入的妇女被认为对家庭有价值，而这也使得她们获得参与家庭决策、为家庭生活作贡献的能力。”卡丽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金钱的力量。但她也明白，改变人们的观念非朝夕可成。她说：“荣誉杀害的发生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政府层面的不利政策；二是对妇女地位的轻视；第三，可能是最大的原因，是妇女们认为这些习俗

就是自己的命运。”不过在卡丽达开始着手改变观念之前，她面对的是传统的族长制社会对她的愤怒。她的生命受到威胁，最终还被迫离开家乡。

传统对抗传统

“在2008年，我们的组织受到了好几次对我们人身安全的威胁。”卡丽达回忆说，“我们受到了来自宗教领袖和社区部落首领的反对。最后，我们不得不放弃一切逃离。”那时，卡丽达的父亲带她搬到卡拉奇，使她能够安全完成学业。

但卡丽达并不打算放弃这一至关重要的事业。“虽然一切暂停下来，我不断思考我们的方案哪里出了问题。‘我是尊重传统的’，我心想。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必须推

广可能有助于结束荣誉杀害的积极传统。这就是我们开始与本地人合作，把他们作为盟友的原因。”

把这一包容性战略转化为行动，仍然需要卡丽达和她的团队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坚持的是同一主张，但采取了一种更温和的方式。”卡丽达说。她利用了对她有利的地方传统，勇敢地去面对曾威胁过她的部落首领。“在我们的文化里，人们不会把访客踢出门——不会有人这么做。”卡丽达与她的团队来到了一位首领的家里，而那位首领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迫听取这些执着的青年人的话并与他们展开讨论。“我们以当地语言，解释我们希望如何促进诸如刺绣、音乐和诗歌等当地的传统”。三位首领对此作出了反应，甚至神职人员也开始按照伊斯兰教进行有关妇女权利的说教。

舒迦中心促进了积极的地方传统，组织妇女生产刺绣制品，并通过参与发展倡议组织的渠道进行销售，还为妇女们提供了一个女性友好平台，使之获得可以施展的财务空间。此外，她们接受增值培训和基础教育培训，如数学、写作和生殖健康等。对卡丽达来说，这意味着提高反对荣誉杀害意识的一个机会之窗。“妇女太逆来顺受了。但我们正在努力改变这一点，通过引用伊斯兰教……。这样，她们肯定能听进去。”她说。卡丽达深信荣誉杀害延续的根本原因是妇女对此陋习的羞怯反应，因此她的主要目标是妇女，但她并没有忽视男性的参与。通过一些创造性的途径，比如板球比赛、互动剧场、手机短信、调频广播、咨询实践以及数字化宣传，参与发展倡议组织通过教育男子来促进妇女权利。在部落首领的同意下，他们还组织了与男子们关于伊斯兰妇女权利的讨论活动。

被问及如何衡量工作效果的时候，卡丽达回答说：“我们的团队



©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PDI)

↑ 卡丽达·布罗希（左前）和“舒迦”项目的受益者们。

从开始的14名女孩发展到了现在的40名。我们既有女性成员，也有男性成员，所以我觉得公众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我听说过发生在邻近地区的荣誉杀害案件，但在过去的三年里，我的社区里没有荣誉杀害案件发生。”

勇敢的楷模

通过自己的积蓄，加上不同协会的资金支持，卡丽达·布罗希在巴鲁基斯坦的一些地区成立了舒迦中心。她成为了“不理性机构”的一名会员，还获得了青年先锋奖和国际青年基金会“青年行动网”奖学金。她在脸谱网上发起了一个“反对荣誉杀害唤醒运动”，为成员提供关于荣誉杀害案件和其它有关信息的更新。但是，卡丽达意识到，尽管她得到了家庭、国际组织和团队的支持，反对者仍然存在。她说：“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是少数，因此他们不公开发表反对言论，但我知道他们在等着揪我们的小辫子。这就是为什么我再三确保我们尽量不犯任何错误。”

参与发展倡议组织扩大了为妇女提供的服务，它积极参加了2008年的一个全国计划，即贝·布托政

府土地分配方案，在信德省无地农妇中的执行。它提出了“为妇女提供土地”计划，并承担了监测分配过程的责任。当发现较大差异的时候，参与发展倡议组织在乐施会的帮助下，发起了一个妇女支持计划。通过当地电台，他们强调了偏远地区的土地方案；他们为存在土地问题的妇女们提供了填写表格、去开放法院的交通和法律支持等帮助。“在三年内，‘为妇女提供土地’计划为信德省3000名妇女中一半的人提供了土地。”卡丽达说。

卡丽达正在卡拉奇就读国际关系、社会学和经济学本科学业，她在往返于巴鲁基斯坦和卡拉奇之间的同时，还努力帮助信德省地区的水灾灾民。在乐施会和罗克代尔基金会的支持下，她为该地区的25000个家庭募集了资金，为12000人提供了救济，参与了重建。

回首往事，卡丽达认为她最大的困难是保持良好名誉——完全是个文化概念——荣誉在她的社会是神圣的，生死攸关的。“作为女孩，你一旦走出家门，就存在举止是否‘体面’的问题。”尽管卡丽达的父母一直以来是她的力量和灵感的支柱，卡丽达记得，当她第一

次接受邀请，去悉尼参加乐施会推出的一个青年伙伴关系活动的时候，甚至她母亲也表示了不高兴。回忆起她母亲说的话“你会找不到丈夫的！”，卡丽达笑了。

但是，卡丽达愿意冒这些风险，继续她的斗争，以激发妇女去要求和保护她们对生命的基本人权。■

诺仙·阿巴斯，26岁，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一名记者。她为半岛电视台、英国广播公司的乌尔都语频道和南亚在线频道工作。她为国际计划和鲁格斯世界人口基金会撰写了巴基斯坦第一个针对青少年的框架政策。



© Numair Abbas



←东京的涉谷区是日本消费性社会的象征。

我们的帮助得知亲人地点的人很感激我们。”从此，宽法对工作和金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说：“现在，对于每个项目，我都会问一下：它对人有帮助吗？我认识到，一个项目的重要性在于社会影响，而不是预算多少。”

国民幸福总值

早在1968年，美国政治家罗伯特·肯尼迪就在他著名的三月十八日演说中质疑了“发展”的概念。他说：“现在，我国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八千亿美元，但它……以空气恶化、香烟广告、清洗高速公路发生死亡事故时的救护车为代价……。国内生产总值忽视孩子们的健康、教育质量和游戏乐趣。国内生产总值不衡量我们的才智，不衡量我们的勇气，不衡量我们的智慧，不衡量我们的知识，不衡量我们的同情心，也不衡量我们对国家的崇敬。简而言之，它衡量一切，但就是不衡量我们不枉此生的东西。”

至于不丹前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他则在1972年倡导了另一种参考指数。这种新的参考指数根据人们的幸福和福利，即国民幸福总值，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

从那以后，围绕这一话题的讨论甚多。今天的日本，已经无法将国内生产总值视作衡量富裕程度的第一指数。过去十年——即此次大地震之前——日本民众的价值观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年轻人，他们逐渐认为日本目前的经济停滞是件好事。

今年23岁的学生天贝佑树来自千叶县，他说：“我们的经济活动如此巨大，已经失去控制。并且，

静悄悄的 革命

柳泽大树

多年以来，日本的年轻人都在质疑：一个迷恋于经济增长的社会好在哪里？今年三月，日本遭遇了地震和海啸，有些人开始呼吁对价值体系进行深刻改造，应该提倡社会福祉和团结互助。

2011年3月11日，日本遭遇了现代史上无前例的大地震，导致一万四千多人死亡、一万多人失踪。地震发生后不到十五个小时，三十二岁的网络经理中原宽法就和朋友们一起建了网站buji.me。该网站收集并刊登有关受害者安危和现状的信息，按城市划分。Buji在日语中表示安全。

宽法说：“最初我脑子中想的就是：如何帮助受害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快速行动以便拯救尽可能多的人的生命。”

他离开东京市中心的公寓，走了三个小时，才走到在涉谷区的女

朋友家。就在那里，他和朋友们相聚，讨论如何帮助受害者。由此，创建buji.me的想法产生了。

宽法说：“十八点，即地震发生后五个小时，我开始起草规则。第二天早上六点网站就开始运行了。接下来的五天我睡得很少，用全部时间来改善网站，以便刊载尽可能多的受害人信息。”

如果宽法和他的团队为这个项目开发票，那么数额大概在五万美元左右。但是，他们得到的安慰是无法用这个数额来衡量的。宽法回忆说：“由于这个项目，我收到了大量热情洋溢的感谢信，那些通过

从小我就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很极端。我承认生活需要钱，但钱不是能满足我深层次需求的东西。与其去购物，我更喜欢去看望年纪比我大的人，和他们交流思想。我尤其感兴趣的是讨论如何改善我们的社会，主要包括环境和促使人们行动起来。”

自从1998年关于非营利协会的法律通过以后，非营利领域在日本获得了快速发展。Service Grant 的创始人嵯峨生马说：“从物质财富来讲，日本已经达到了难以与之相比的顶峰，但从社会制度来讲，它是不完整的、不正常的。许多积极的青年和非营利协会正在努力缩小这种差距。” Service Grant 是在志愿者和协会之间牵线搭桥的日本最大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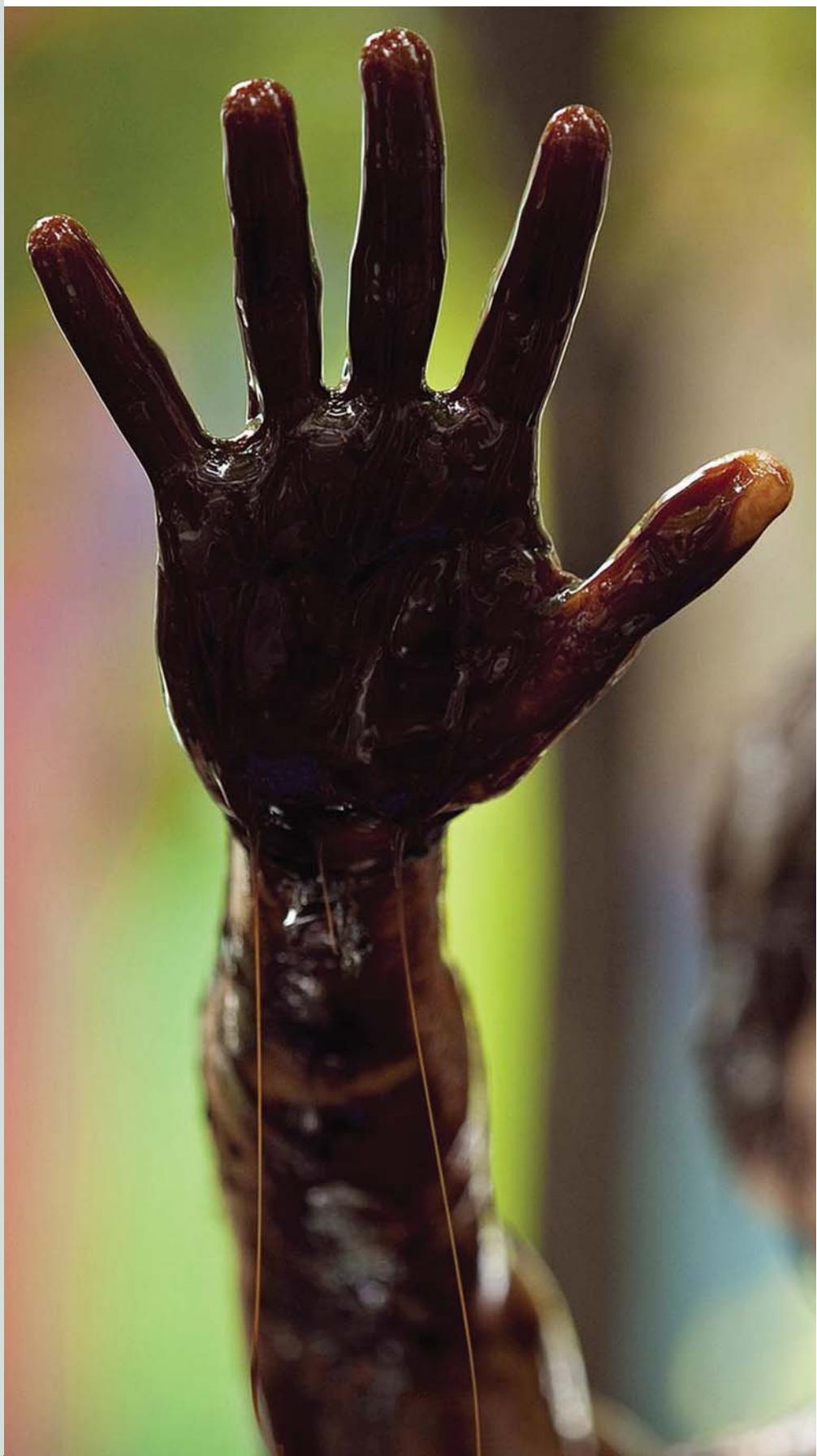
鉴于日本的人口持续减少，有可能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在不久的将来超过日本。但是，这没什么好担心的。凭借其青年，日本肯定会变得更加幸福，更加强大。■

柳泽大树，33岁，自由记者，edgyjapan.jp网站创建者。edgyjapan.jp是个多媒体网站，介绍并连接日本的人才、产品和创意网站。他在东京和香港之间生活、工作。



© Terrie Sato

他们年轻、上网、希望参与相关的辩论。世界各地的青年成立气候运动，使自己能在气候变化大会上拥有发言权。因为，这事关他们的将来。



为了事业而

2010年9月世界能源大会期间，反对矿业和石油业的游行示威，加拿大蒙特利尔。

© François Pesant / Greenpeace

叛逆

延斯·卢巴德

“我只是个小孩，我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我想要你们知道，你们也没有！”

1992年，瑟玫·卡利斯-铃木在里约热内卢联合国地球峰会发表讲话时——这一发言现在很有名——她才12岁。“你们没有办法修补臭氧层的破洞。”她说，“你们不知道如何让三文鱼回到已经污染的河流，你们没有办法让灭绝的动物重新出现，你们也无法让已经变成沙漠的地方重新成为森林。如果你们没有办法修补，就请不要再去破坏！”

近二十年后，她的话没有被遗忘，甚至在网上大受欢迎。她在YouTube上的视频片段《让世界沉默六分钟的女孩》至今依然让人鼻子酸酸的。

虽然瑟玫·卡利斯-铃木是加拿大人，她代表的是全世界的儿童和青少年，特别是那些没有像她那么幸运，生长在加拿大这样的富裕国家的青少年。青少年占了人类的三分之一——20亿人，在大多数情

况下，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他们的命运掌握在成年人手中。

“你们在决定我们将在什么样的世界里成长。”瑟玫说。

被抵押了的遗产

代与代之间的冲突是真实存在的——青少年们已经认识到老一辈给他们留下的既是经济债务又是生态债务。2010年，欧洲联盟（欧盟）的27个成员国欠债约8.7万亿欧元。对我们来说，很难想象万亿究竟代表着什么……。万亿是一千个十亿，或者“1”后面十二个零。每个欧洲孩子一出生就背上了约17000欧元的债。这一债务是政治懦弱造成的结果，这种懦弱把负担转嫁到了无法为自己辩护的人们头上，因为他们或者太年轻，或者甚至尚未出生。

生态债务，经过近一个世纪几代人的积累，已经巨大非凡。现在我们消耗的能源和矿物资源超出了地球可以承受的范围。自工业革命开始，人类释放了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到大气中。由于温室效应，地球正在变暖——自1905年以来，地球的平均气温上升了0.74摄氏度。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有记载

以来最热的十年。而且，人们已经可以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如北极浮冰消退、与气候有关的灾害频率增加、海平面上升以及冰川融化。

“地球不是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它是我们从子孙那里借来的。”青年气候运动网站 (<http://youthclimate.org/>) 上这么说。美国印第安人的这一谚语对气候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概括——今天的青少年最终将不得不为我们浪费的生活方式付出代价。网站上说：“当我们迈入一个碳约束的世界，人类今天的行为对未来的后果将由青少年们承担。”

青年气候运动团结了世界各地的青少年，在各大洲不同国家均设有分支机构。自从2005蒙特利尔（加拿大）气候变化大会以来，每个国家成员都会派代表参加世界气候会议。

“我们这一代青年明白，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将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所以我们大家都有责任采取行动。”29岁的涅瓦·弗瑞奇维尔解释道。他是英国联盟的国际协调员。如今的青少年不想只是被动地看着成年人决定他们的未来。“我们开始表达我们的无法容忍。我们会自己动手来改变这一切。”涅瓦补充说。

2009年，该联盟的国家分联盟建立了代表所有青年非政府组织的YOUNGO。该组织正游说各国，争取实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到2050年减少85%（与1990年的排放量相比）。YOUNGO已被正式确认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内代表青年利益的相关方。这个地位现在还是临时的，但以后会改变。“2011年对YOUNGO来说，是令人激动的一年，是它获得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利益相关方地位的一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



© Jason deCaires Taylor/Greenpeace

↑英国艺术家佳桑·得开罗·泰勒的水下布景《默默的演变》，表明海平面升高的危险。2010年坎昆（墨西哥）气候变化大会之际，她的作品展示了一些年轻人在淹没了400具雕像的世界里的演变。

书克里斯蒂亚娜·菲格雷斯解释说，“因为就在今年YOUNGO的利益相关方地位可能正规化。当然，正规化并不意味着参与的‘开始’，因为儿童和青少年从2000年就已经开始参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会议了。”

在哥本哈根（丹麦）和坎昆（墨西哥）的气候变化大会上，青少年第一次用共同的政治声音发表意见。“如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其他利益相关方，YOUNGO限于观察员的地位”，涅瓦解释，“从本质上讲，我们不能参与谈判，我们

能做的是观察，和通过游说和行动去影响谈判结果。承认我们在谈判过程的利益相关方的合法地位，意味着青少年有更多接触这个过程、谈判各方和秘书处的机会。”克里斯蒂亚娜·菲格雷斯对此表示赞同，“该利益相关方的地位为青少年与秘书处之间的信息交流提供了一个渠道，并有助于协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的青少年代表的积极参与。”而且，涅瓦补充说：“青少年们还被邀请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最高水平进行干预，这给了全世界的青少年发表言论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六年里，这些青年活动家定期召开他们的会议，就在世界气候变化大会的前几天。

并非毫不关心政治

我们常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关心政治。但仔细再看看，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诚然，年轻人对传统的政治不太感兴趣，对政客们和他们的政党更没有什么敬意——16至29岁的欧洲人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信任他们。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在年纪更大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也不高。塞西尔·勒孔特是一名29岁的法国女子，她为保护环境而开展运动。她住在德国北部的吕讷堡，以她令人惊叹的特技吸引了众多关注，她为了制止核废料通过铁路运输，把自己挂在铁轨上方。对她来说，“对政治缺乏兴趣不只是年轻人的立场。”

现在的青少年普遍对政治缺乏投入的热情，诚然这与对政客的信心不足有关。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只有4%的欧洲青年是政党成员。只有16%的人认为，议会是最好的表述自己意见的地方。

在现实中，他们参与政治的形式不同一般。涅瓦说：“我们非常关心政治，而随着我们权利被剥夺和理想破灭的情况加剧，我们变得更加关心政治。”欧洲青年们认为，非议会形式的政治参与更为有效——举办辩论（30%）、参加示威游行（13%）或支持一项请愿或者一个非政府组织（11%）。塞西尔赞同这个说法。她认为，青年人的抗议行动一直以来有了大幅增加。

世界各地可能都出现了这一趋势，特别是在那些严格控制传统政治入口，缺乏民主的国家。

本文中引用的关于欧洲青少年的数字出自欧盟执委会欧盟统计局《欧洲青年统计肖像》，2009年版。



© Boy Scouts of the Philippines

↑ “生命之票”项目的童子军在清理菲律宾马尼拉海湾。

“除了最近在英国举行的针对学费的抗议，在埃及和突尼斯，也发生了主要由青年领导的运动”，涅瓦说，“而欧洲青年正团结起来，绕过‘大人’的非政府组织，联合对欧盟政策施以影响。”

对克里斯蒂亚娜·菲格雷斯来说，青少年们在国家一级的参与比他们在国际上的参与更重要。“我一直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他们国内有关谈判立场和气候友好政策的制订”，她说，“那里是他们能发挥最大影响的地方，他们可以影响各国政府去发展长远观点，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正是我们的下一代。”

有一点很有趣，年轻人们更愿意相信政治机构，如议会等，而不是政客们。国家以上的机构吸引更多的支持——70%的青年表示尊重欧洲议会和联合国。在这一点上，年轻人与年纪更大的人们有明显区别。他们考虑问题可能不再以国家为界，他们把联网与合作作为鼓舞信心的积极因素。涅瓦同意这个观点，说：“青年们已经表明，为了一项共同的利益，把一国的利益放在一边，同心协力是可能的。”

互联网确实发挥了一定影响。在2008年，有70%的青少年每天使用全球资讯网，这一数字在最近几

年还有所增加。这里存在一道真正的代沟——青年比老年人更容易掌握使用互联网带来的各种可能。社交网、推特微博和聊天室使用得更多，而且代表着新的关系和联系方式。“比起气候变化公约的‘老’代表们，我们能更有效地使用新的社交媒体”，涅瓦解释说，“我们更有创意，拥有更多创新和更多乐趣，因为我们不被旧的活动风格和习惯所蒙蔽；我们还在为找到解决方法而做准备。我们的交流往往更为积极——‘支持’比‘反对’更多——因为从根本上说，我们正试着展望我们想要的未来。” ■

蒂斯·卢巴德，36岁，是德国《绿色和平杂志》的记者。自从2009年以来，他一直担任《教科文组织信使》的通讯员。



© Claudia Wüstenhagen

刻不容缓

2009年12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一群奇怪的医生和路人攀谈，提供健康检查并开方。他们的行为与人们关于中国医生身着传统服装、老而慧的印象形成了明显对比。事实上：他们不是医生，路人也不是病人。但他们对于地球的诊断是真实的。

赵颖

詹育峰每天平均工作12小时且周末无休。这个24岁的小伙子是非营利性协会“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以下简称青年气候网络）的负责人。“我很忙。我要培训志愿者、为项目筹款、或者与合作方会面。”他解释说，“有时不得不在办公室过夜。”

詹育峰去年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艺术设计专业。他应邀参加青年气候网络的2009年10月24联合国日宣传活动准备工作时，对气候变化还所知不多。

但是，他为那次活动设计了标志、海报和宣传册。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200余个高校、50余家非政府组织的参加。活动的总参与人数估计达到了500万。“我和志愿者们持续工作了大概一个月，大家都非常认真努力。我真地没想到我一下子喜欢上了这项工作，就好像是一见钟情的感觉。”詹育峰回忆说。

有大约3万名中国青年直接参与到活动中。活动得到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机构的支持。志愿者们的行为艺术表演给詹育峰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有的社团用电风扇给雪山降温；男同学们把身体涂成蓝色在海边站成一排，警示全球变暖引发的海平面上升；有的以骑车或轮滑代替开车。

詹育峰说：“我从同龄人身上深切地感受到了热情、坚韧和力量。”他还说，这一活动使他发现了物质社会闪光的另一面：年轻人正在为建造绿色星球和洁净未来而积极努力。

活动一结束，青年气候网络的负责人们就开始在中国招募志愿者以组建代表团赴哥本哈根参加2009年12月举行的第十五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这是中国青年第一次组团参会。

那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因为他们认识到数百名来自美国、欧洲和全世界其他地区的青年代表参加了2008年在波兰波兹南举行的气候谈



判大会，但中国青年代表却只有一名。

詹育峰对于是否加入代表团感到犹豫。他说：“我担心由于自己英语水平不高而影响整个团队的工作。”不过最后他还是加入了代表团，负责摄影和活动策划。

除了构想口号、设计体恤衫和海报、拍摄会议，詹育峰和团队成员也组织了不少活动，如“中医诊断，为地球开出药方”活动：身着传统中医服装的他们向参会者提供“健康检查”，在反对气候变暖请愿书上签字的参会者收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药方。

此外，团队成员还与杰出的中外负责人、记者、谈判代表进行了讨论，其中包括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和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

中国青年团打出的口号是“刻不容缓”，英文缩写意思是“现在”，呼吁全世界公民立即行动起来投身低碳环保、制止气候变暖事业。



← 詹育峰在丹麦哥本哈根的第十五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举着青年气候网络的的口号旗帜。

地球比时尚更重要

如果詹育峰毕业后按照预计从事设计行业，那么他的收入应该大约是现在的三倍。但他说：“我并不急于挣钱。现在最重要的是锻炼自己的能力，而青年气候网络恰恰是一个让我可以接触各行各业的人、不断学习的地方。”

筹款和培训新人是让詹育峰比较操心的事情。去年有三个月，青年气候网络的工作人员没有领到工资。“那段时间确实不容易，不过我们还是挺过来了。我们做的一个项目策划方案后来获得了基金会的赞助。”

此外，团队里一些精英离开了，转到其他行业或出国深造，青年气候网络不得不招募新人。“中国有很多青年社团，但关键问题是要提升他们的专业性，只有这样中国青年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响亮的声音。”詹育峰总结说。■

詹育峰友情授权

光听不够

詹育峰认为第十五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显示出中国青年环保志愿者在能力上存在的差距，主要是语言方面。中国青年团的大部分成员虽然能理解发言内容，但却没有多少人能用英语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它国家的青年代表的专业性给詹育峰留下深刻印象。他说：“很多国际青年组织的成员都谙熟气候谈判会议的架构和政策……。他们往往能提出一些有启发性的建议。而我们，我们光是听。”

中国的高校里很少开设气候谈判方面的课程，中国的年轻人参与相关国际交流的机会也不够多。

为了迎接第十五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青年气候网络对团队进行了培训，帮助他们了解会议的框架体制、气候变化议题、筹资、公共关系维护和项目运作。但詹育峰认为这些还远远不够，必须提供经常性的培训。从第十五次联

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回国不久，詹育峰成了青年气候网络的一名全职工作者。

青年气候网络由7个青年环境组织于2007年共同发起成立，仅有三名全职工作人员，而其大量工作都是依靠51名在北京的志愿者和9名在国外工作或学习的志愿者来完成的。

詹育峰和这批年轻人共同组织了一系列与气候和环保有关的活动，如2010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国际青年能源与气候变化峰会，以及吸引了中、美、印1000多个学校参加的清洁能源竞赛项目“三国智”。现在，詹育峰成了青年气候网络的负责人。

詹育峰来自中国南部沿海省份广东省，父母在家乡做生意。他在北京上学期间喜欢业余时间逛逛画廊、看话剧和电影、或者和朋友们打台球。但现在他的工作时间表已经不允许他再享受这些兴趣爱好好了。

赵颖，34岁，1999年成为新华社记者，负责报道2010年上海世博会。她现在是中国特稿社记者。中国特稿社是新华社的一个部门。



© DR



© Gerardo Montes de Oca
Valadez (Guadalajara)

自行车上的生活

2011年初一个晴朗的早晨，墨西哥雅利斯科州的一个小镇萨波潘，一群三十人左右的青年入侵了圣玛格丽塔大道。他们在一辆三轮货车后面固定了一个标线设备，然后就出发了！到了中午，五公里长的圣玛格丽塔大道镶上了一条白色的边，柏油路面上画上了自行车的象形图案，路标装上了杆子。

露丝·佩雷斯·洛佩兹

照片由杰拉尔多·蒙特斯·德·奥卡·瓦拉德兹拍摄。他33岁，是一名墨西哥心理学家、艺术家和“大家的城市”会员。另见 <http://gmove.wordpress.com/> 和 <http://www.flickr.com/photos/gmov/>

新建成的车道马上就有了自己的名字：市民自行车道。车道安装的费用，约合1000美元，出自这些青年积极活动人士的腰包。虽然他们并没有得到许可，这条新的自行车道的非法地位很快就“转正”了。就在第二天，雅利斯科州的交通管理局作出了有利于此倡议的规定。它不仅承诺对自行车道进行改善，赋予其道路地位，还承诺，将来类似这样的市民倡议，只要符合《非机动车机动性总体规划》，都会予以认可。

什么总体规划？故事开始于2007年的瓜达拉哈拉——墨西哥的第二大城市，雅利斯科州的首府。市民们组织了抗议，反对市政当局把洛佩斯马特奥斯大道变为高速公路的决定。波莲娜平常开车去大学上课，她可能会从中受益，但她觉得这个决策未咨询当地社区，违反了她的利益。那正是她当时在学习的问题——公共行为的治理与透明度。而对哲学专业大学生、热衷自行车运动的何塞来说，对一个鼓励

汽车使用的城市发展项目，他只会投反对票。今天，分别在24岁和27岁的年纪，他们已经成为完全合格的城市规划和可持续发展专家。他们像专业人士一样讲话，与当局进行谈判并接受媒体采访。“我们必须学会如何进行辩论，并向政治决策者提出我们的论据。”何塞解释说。他们深有体会，尤其因为他们第一次对洛佩斯马特奥斯大道的抗议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那次抗议中创建的市民团体“大家的城市”，是对社区的一个持久贡献。

“大家的城市”青年会员与雅利斯科州当局之间的对话从那时起持续了好几年，前者尽力说服后者，使其明白在瓜达拉哈拉市区——包括萨波潘在内的八个地区——建立自行车道网络的重要性。此次对话产生了《非机动车机动性总体规划》，一份近千页的书面文件，由一家顾问公司在民间社团的参与下撰写。但是，正当他们似乎赢了这场战斗的时候，一个对该问题不那么敏感的新政府上台



“游牧公园”项目场景
 © Gerardo Montes de Oca Valadez, Guadalajara

了。这些青年耐心地再一次从零开始。他们向新政府提出了为推行该计划的拨款要求。没有结果。因此，他们决定自己动手，划出他们的自行车车道。“我们没有任何法律手段可以迫使他们把计划付诸行动，”何塞回忆说，“所以我们决定自己来负责。”受到当局的认可之后，今年三月，他们用同样的方法在萨波潘又造出了另一条自行车道。

兼顾欢乐与安全

“大家的城市”青年会员发起的战斗并没有就此结束。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发起了众多项目，旨在城市的不同地区改造公共空间。为反对在英格兰大道上建设高速公路，他们在沿街居民的支持下，推出了“带状公园”项目，使把大道分成两条车道的中央隔离带变得美丽。他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公园，并且每个星期六在那里会面，参加各种活动——种植树木、设计花坛以及上演儿童节目。“游牧公园”是

另一个项目，该项目占用通常为汽车保留的空间，他们占用一条或两条行车道，在那里设立游戏场地、播放音乐、组织比赛或足球比赛。他们的目的不是堵住车流，而是让车流慢下来，并弥补城市休闲空间的不足。晚上，他们组织露天放映电影和纪录片。

换言之，这些青年人不是只会抗议。他们热情洋溢，以一种活力四射、好玩有趣的方式提出城市发展的替代形式。本文插图的拍摄者、“大家的城市”活动人士杰拉尔多说，公共空间的布局必须能够鼓励人们进行互动。它应该是“一种对欢乐的邀请，能加强社区的联系，维护社区的特征”。正如杰拉尔多所强调的，该团体改造城市与公共空间社会互动模式的尝试有助于减少城市犯罪。最重要的是，它们促成了良好的市民权利和参与性决策的发展。因而，这些青年的行动不仅影响了公共空间和居民的生活方式，它们还影响了城市的政治。■

人生就像骑自行车。
 为了保持平衡就得
 往前走。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露丝·佩雷斯·洛佩兹，34岁，是一名西班牙社会人类学家和墨西哥一个拥护自行车和可持续交通的团体Bicitekas A.C.的会员。她以贫穷、青年、公共空间和社会变革为主题写了几本书和一些文章。



© Annika Börm, Mexico

有什么东西既可以用来储水、越冬，又可以用来当住所、冰屋，还能当水车磨坊、独木舟或木筏？难以找到答案？然而，这样的东西是存在的。它以回收的塑料瓶和钢丝绳制成，称作“生态圆筒”。它的发明者，26岁的青年建筑师卡洛斯·巴特萨奇·考克解释了他为什么创造这个物体以及许多其它东西的原因。

卡洛斯·巴特萨奇·考克

© Carlos Bartsaghi Koc



绿色建筑

我们常常自问，到底是什么使我们的生活朝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发展。对我而言，是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让我好几个月卧床不起，徘徊在生死之间的一场大病。在那长期的孤单生活中，阅读和沉思使我把艰苦的经历变成了强化精神和人格的锻炼。

经过几年的挣扎，我恢复了健康。我觉得我必须好好利用这上天赐予的第二次机会，把我的生命和工作投入到为最贫穷的人带来改变和进步的事业中去。

我在孩童时期就选择的职业——建筑——通常被认为是远离

社会弱势成员的行业。在人们心目中，这一职业常与几个顶尖建筑师的威信和声誉以及他们壮观奢侈的建筑联系在一起。我想改变社会上这种对建筑师形象的老式过时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我想把自己完全投入到对可持续建筑、新技术、气候变化及减轻自然灾害风险的建筑研究和项目开发中去的原因。

经过多年努力，我从家乡秘鲁圣阿古斯丁·德·阿雷基帕国立大学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这是我登上的第一步台阶。后来，几个月后，我获得机会参加了一个关于环保新方案的国际竞赛。在我的导师的支持下，我准备了一个改造阿

雷基帕河流域的项目，旨在鼓励农业领域参与性旅游的发展的同时，保存当地农业。

我的项目获了奖，我得到了前往德国参加由拜耳公司举办的青年环境大会的机会。我是与会的约100名青年环保人士之一，我们聚集在一起讨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和文化途径。

此行促成了我开始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青年杂志《Tunza》撰

本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青年杂志《Tunza》合作写就。请见：
<http://www.unep.org/chinese/tunza/youth/>

稿的事。而这使得我与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青年交流意见和经验，这些交流成为我的灵感和动力的极好源泉。

我开始组织一些展览、活动和运动：我开办讲座，并受到大学的聘请担任了助教。我与当地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合作，从而能够设计一些较大规模的社会环境项目。这些使我走遍了秘鲁山脉，并由此看到了我国日益增加的贫困和社会瓦解现象。

创新技术

这一经验证实了我长期以来的信念：在像我国一样的新兴国家，我们必须使用成本极低的技术，才能适应不同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这就是例如“生态圆筒”的想法的由来——它是用回收的塑料瓶和钢丝绳组装成片，再一层层粘起来制成的一个多功能住所。根据当地的需要和气候条件，这个圆筒可以有上千种不同的使用和改造方式。它可以用来储水、越冬、又可以当住所、冰屋，还能当水车磨坊、独木舟或木筏。

其它项目，如系统农业旅游和采石场生态旅游，都出自同一原创想法，即把农业与参与性旅游联系起来。在前者情况下，当地居民为游客提供免费住宿，作为交换，游客帮助居民进行耕作并学习祖

带“自建住所”
的“系统农业
旅游”项目全
景，2009

© Carlos Bartesaghi Koc



© Bayer AG

↑ 秘鲁建筑师卡洛斯·巴特萨奇·考克2007年在德国勒沃库森作为“青年环境特使”为拜耳公司作陈述。



© Carlos Bartesaghi Koc

↑↓ 卡洛斯发明的生态圆筒可根据不同地理位置、需要和气候条件以多种方式使用和改造。



© Carlos Bartesaghi Koc

传的耕作方法。该项目还呼吁“自建住所”，即农民们使用回收材料和城市垃圾建成的房屋。第二个项目是在阿雷基帕著名的火山岩采石场内规划设计新的城市旅游路线。这些路线一旦成立，将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同时保护和改善采石工人的健康和条件，这些工人冒着采石场被野蛮收回的风险。

目前我正在进行阿雷基帕城市垃圾处理厂的一个项目（是我的职称论文），其中包括建设一个有控制的垃圾填埋场，并最终将其改造成一个景观公园的建议。该项目包括建设一个分拣无机废物的工厂和一个堆肥生产装置。目前在那里工作的临时工人将会获得正式工作合同，和更好的健康、卫生和安全条件。就在同一地点，他们还会得到培训机会，享有儿童保育和休闲设施。在那里，还将建成一座垃圾场博物馆供儿童和青少年参观，并为他们提供教育材料。

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继续进行教学，开发低成本、环境友好的建筑。我希望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公平和尊严，使之成为更适合人类和大自然的地方。■

卡洛斯·巴特萨奇·考克的网站：
<http://www.wix.com/carlosbartesaghikoc/cbk>



每一代人
在这场革命
中都发挥了
作用，即使
是那些已不
在人世的
人们。



2011年4月13日，卡莱德·尤瑟夫在教科文组织其电影《混沌》放映之时。

革命： 文明的伟大壮举之一

他的电影被指控为帮助鼓动了2011年1月的埃及革命，对此他没有否认，也没有居功的意思。对与尤瑟夫·夏因联合导演了《混沌》（2007年）的卡莱德·尤瑟夫而言，《阿拉伯之春》的影响跨越了几代人和国界。在本次采访中，他提出了自己对这些事件，及其对艺术、社会和国际政治带来的后果的看法。

卡莱德·尤瑟夫接受哈立德·阿布·希吉拉的采访

您是支持1月25日埃及革命示威者诉求的著名人士之一，而且自己本身也积极参加了革命。您的动机是什么？

我认为我的参与是预料中的必然结局。我担任学生会主席

的时候，参加了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反对政府的决定，尤其是关于海湾战争的决定，也反对延续压迫和社会不公的国内政策。

所以，当青少年使用脸谱网号召示威游行的时候（开始是为了反对警方的专制行径），从第一天开始我就参与其中了，这对我而言是理所当然的。

2011年1月25日当我们抵达塔利尔广场进行示威的时候，那里聚集了约20000至25000人。示威者人数不断增加，到半夜的时候达到了约80000人。就在那时，当局下令使用武力来驱散示威者。我在这一代青年的眼睛里看到了我那代人所没有的决心。这些青年以一种在以往的示威中我从未见过的坚韧抵抗着警方。那时我开始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场革命的预兆。到周五1月28日，当我们分成三组走上街头之时，我已经确定这是一场革命。一组去了穆罕德幸区的穆斯塔法·穆罕默德清真寺，另一组去了吉萨的伊斯提卡玛清真寺，第三组去了亚巴西亚区的努尔清真寺，离市中心的塔利尔广场都不远。我在穆斯塔法·穆罕默德清真寺组。因为看不清身后游行队伍的大小，我爬上了一辆轻型货车的后车厢。在我的眼

↓ 开罗美国大学的学生们在游行，以提高大家对埃及民主转型需要的认识。

前延伸的队伍，长到我看不到它的尾部。就在那时，我说，这就是一场革命。

您认为，您与伟大的埃及电影导演尤瑟夫·夏因联合执导的电影，比如2007年的《混沌》，是否帮助提高了埃及青年的政治意识？

我不能说我对发动这场革命有什么功劳。这既是一个指控——我不否认这一点——也是我不应得的一项荣幸。但确实有一些人认为我们的电影，其中一些是在二十世纪80年代拍摄的，在塑造领导这次革命的几代人的意识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个国家的青少年不会是“自发的一代”。青少年的这种意识，是从诗歌到政治、音乐、戏剧和电影等各种人文表达形式影响的结果。因此可以这样说，每一代人都在这场革命中发挥了作用，即使是那些已不在人世的人们。所以，对我来说，导演阿提夫·艾勒-塔耶布（1947年至1995年）、尤瑟夫·夏因（1926年至2008年）以

及所有相信人民的意愿、和普通民众站在一起的人们都发挥了他们的作用。

您会不会觉得1月25日革命将会影响您以后的电影？它是否会从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毫无疑问这场革命不仅将改变电影的性质，也将对所有其它艺术形式和文学产生影响。我觉得我们所希望的社会复兴会随着文化复兴一起到来。新的思想以及代表这些新思想的新方法会出现，它们反映了政治气候和艺术创作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

如果我们回到1952年7月23日的革命（那场革命产生了《埃及共和国宣言》），它也标志着电影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甚至影响了一些爱情故事。公众世界和私人世界是交错混合的。这让我想起了伟大的叙利亚诗人尼扎尔·格巴尼（1923年-1998年）。他在诗歌里，想知道有哪对恋人在尼罗河或幼发拉底河岸边相会之时，没有见过去杀害巴勒斯坦、伊拉克或黎巴嫩的孩子的飞机飞过头顶。

不过，话虽如此，我认为



我们将见证一次艺术和文学的伟大复兴，也许不会立即发生，因为人类的表达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成熟。

我们正迎接一些重大变化，任何人跟不上目前正在诞生的新埃及的步伐，就会处于不合群、被孤立的处境。

电影首先是一种影像。但是，这一影像如果没有对未来的构想，是缺乏新意的。因此，电影在表现影像的同时，必须牢牢扎根于现实，忠实地反映现实。

现在为1月25日革命下任何结论尚为时过早，但您对目前的结果觉得满意吗？

我对这场革命已经实现的一切非常满意，并且对未来持乐观态度。革命是变化的科学。首先，它引起了政治制度的改变。统治政权的垮台具有象征意义，代之而起的是基于自由、平等、民主和社会公正等原则——这些也是这次革命的所有关键要求——建立的新政权。我认为，这些示威者高举的原则，将是埃及社会模式变化的基础。1952年7月23日革命之后，中产阶级从原来的占社会总数的5%提高到了90%。当时，这代表了埃及社会的一个根本转变。因此，我相信，最近的这次革命，很快将以同样的方式转变既定的社会秩序，以及社会的性质和结构本身。埃及人民进行了这场革命，他们的意志是不可违背的。

我一直认为，人民的意志承载着上帝的旨意，那是没有人能打败的。埃及人民通过这一举措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我指的是这次伟大的革命，它构成了文明的伟大成就之一。要说即将到来的变化将是肤浅的，或者说新政府会像前政权一样建立专制国家控制的形式，在我看来这些是不太可能的。

您曾经说过，我们正在向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发展，其中由埃及主导的阿拉伯世界将占据一个突出的位置。我们是否可以期待阿拉伯世界将会发生一次整体变革，证实您的这一远见？

（笑）整个世界都在谈论阿拉伯革命之“春”，这并不让我感到吃惊。每个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它不是一个幻觉。当前革命浪潮的到来是人们可以看到的。而当一个地区大国如埃及经历了一场革命，我们可以肯定，革命真实发生了。这不是爱国沙文主义，而是历史和地理事实。埃及的改变对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有影响。正如在过去四十多年里，当埃及奉行自闭政策拒绝发挥其真正作用，整个阿拉伯世界被削弱，而埃及的重要性也被削弱了。但是，当埃及接过其应有的领导者地位，阿拉伯世界将经历第二次复兴，你可以肯定这一点。

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革命不一定会采取与我们一样的形式。每个阿拉伯社会都有其自己的运作方式，但必然地，每个社会都会逐步发展，其不同政权毫无疑问将为公民参与、民主、言论自由，以及财富的公平分享腾出空间。



↑ 卡莱德·尤瑟夫电影《混沌》的法语海报。

至于多极世界，这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已得到证明。一个国家行使权力指挥世界的阶段，只能是人类进步的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阶段。显然，美国将保留其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角色，但它不会是唯一的，而是与其它超级力量共存的，如俄罗斯、日本、中国、以德国和法国为首的欧洲、以及由埃及主导的阿拉伯世界。这样，当大国利益受到威胁时，阿拉伯世界将作为世界第六大力量进入国家联盟，与其他领导国家一起表明自己的立场。■

如果不是因为尤瑟夫·夏因，我不会成为一个电影制片人

“除了上帝的旨意，尤瑟夫·夏因是我之所以成为电影制片人的原因。不仅因为他教会我电影制作，给了我这一行的锻炼机会，而且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他，我决不会在这个领域工作。我遇见尤瑟夫·夏因的时候，我正在学习成为一名工程师。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去拍电影。尤瑟夫·夏因发现了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而且不断否认的天赋。三年后，我最终对自己说，试一试没有坏处。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他是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所有的成功都应归功于他的原因。

在开始的十年，我担任尤瑟夫·夏因的电影联合编剧和副导演，这十年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我了解了电影行业。我第一部完整长度的电影《风暴》，是在2000年拍摄完成的，它打开了通向我职业生涯第二阶段的道路，这个阶段是我真正作为电影制片人生涯的开始。从那时至2011年，我制作了十部影片，平均每年一部。其中一些影片本身是重要的阶段性里程碑，如《混沌》、《待情况好转》和《谢哈塔的店》。这些影片已经引起了埃及社会大多数人的兴趣，无论在影评还是在电影节上都赢得了更多的认同。事实上，评论家们认为这些影片帮助改变了埃及公众对政治、社会和艺术问题的意见。” - 卡莱德·尤瑟夫



© 2007 Nigel Parry/CPI



© UNESCO/Anja Freindorf

弗雷斯特·惠特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亲善大使

2011年6月21日，美国演员弗雷斯特·惠特克在教科文组织总部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与和解”亲善大使，以表彰其对艺术和人道主义的奉献。

五十岁的惠特克先生出生于德克萨斯州，先后扮演过各种令人难忘的电影角色，包括在凯文·麦克唐纳导演的《末代独裁》扮演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他目前正在导演的电影《更好的天使》——标题取自亚伯拉罕·林肯的就职演说——反映了乌干达儿童兵的生活。

弗雷斯特·惠特克还以其人道主义项目而著称，这为他赢得了人道主义奖——该奖项为表彰促进人类尊严和自由的电影和电视剧本而设，以及洛杉矶希望奖。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与和解”亲善大使，弗雷斯特·惠特克将主要支持青少年计划，特别是与和平教育和人权有关的计划。他将参加明年10月在教科文组织举办的第七届青年论坛。■

女童与妇女教育 全球伙伴关系新计划

2011年5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是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女童与妇女教育全球伙伴关系计划启动仪式上的特邀嘉宾。此项新计划将主要关注全球，尤其是非洲和亚洲的中学教育和成人识字率。

两位国家总理，马里总理西塞·玛丽娅姆·凯达玛·西迪贝和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西娜，参加了当天在教科文组织举行的高端论坛。出席会议的还有

阿加汗（阿加汗发展基金会创始人和董事长），以及一些参与伙伴关系计划的企业巨头如诺基亚、宝洁、环球教育集团、微软、苹果和帕卡德基金会的代表。

全球目前约有3900万初中适龄女童既没有在小学也没有在中学教育领域入学。全世界7.96亿成人文盲中有三分之二是妇女。在中学教育领域，全球只有约三分之一国家实现了性别平等。■

书籍的未来

“明日的书籍，写作的未来”是教科文组织2011年第二届世界文化及文化产业论坛的主题，该论坛于6月6日至8日期间在（意大利）蒙扎的皇家别墅举行。

教科文组织举办的此次论坛，汇聚了来自40个国家，包括作家、出版商、科学家、媒体从业人员、图书管理员、社会学家、博客作者、研究人员及政策制定者在内的约200名代表，围绕电子书籍（经济、版权、图书馆）的崛起问题展开了讨论。

“当今的书籍正面临着其自身历史上最为深刻的变化，”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会议开幕时说，“任何公司或图书馆都无法宣称自己持有通向未来的钥匙。此次世界论坛完美地体现了开放精神，而这种精神是我们必须保持的。”

论坛向蒙扎地区的高中直播，约800名学生因此得以观看会议进展。■



© UNESCO/Bruno Colla corda



© UNESCO/Ania Freindorf

“人与生物圈计划” 40周年

为庆祝其成立40年，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于6月27日和28日在德国德累斯顿组织了一次国际会议，主题是“为了生命，为了未来：生物圈保护区与气候变化”。

会议对这一旨在促进环境保护与人类活动之间平衡的计划所取得的开拓性成果作出了评估。

会议议程包括生物圈保护区作为实施气候变化的工具所起的作用等主题内容。

生物圈保护区旨在协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地社区积极参与了生物圈保护区的管理、科研、教育以及培训工作，使它们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优秀实验场所。■

沙希·塔鲁尔： 关于社交 媒体网络

2011年6月7日，首位在工作中使用推特微博的印度政治家在教科文组织做了一次演讲：《在全球变化背景下的交流和社交媒体》。沙希·塔鲁尔强调了社交媒体网络在民主化（包括“阿拉伯之春”起义）、自然灾害（如在海地或日本）和国际外交等方面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

他举美国总统奥巴马当选后不久访问加纳的事为例。在白宫宣布了其行程之后，奥巴马总统通过脸谱网和推特微博，收到非洲人民从非洲各地发来的问题数量超过了25万。

“社交媒体网络是要长久存在的。”他说，“我们必须与之共存。因此，让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

印度议员沙希·塔鲁尔曾任联合国总干事主要顾问、联合国通信与信息副总干事。他出版了众多具有国际影响的书籍，包括《尼赫鲁，创造印度》。■

“世界记忆”：聚焦澳大利亚

过去，我们记忆的守护者是石头、纸张和羊皮纸，而现在，电影、多媒体和互联网成为了我们后代记忆的守护者。受这个想法的启发，教科文组织在1992年发起了“世界记忆”计划，以保护人类的文献遗产。

“世界记忆”计划为众多书籍编写了索引，如用金属活体字印刷的最古老书籍——古登堡42行《圣经》，以及大量著名作家（汉斯·克里斯安·安徒生、阿斯特里德·林德格伦、克里斯托弗·奥基博、德里克·沃尔科特等）的作品集。

“世界记忆”计划每两年收录新文档入其典藏，并授予个人或团体教科文组织/直指世界记忆奖，以表彰他们为保存文献遗产并使公众可用而作出的贡献。

今年，由大韩民国独家赞助的3万美元奖金授予了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

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成立于1960年，致力于与专家及有兴趣的公众共享专业知识，和开放数字化保存开源工具。该档案馆还在保存用铁胆腐蚀性墨水书写的文献方面展示出创新能力。■

探索世界

不过寥寥数页，有关教科文组织及其各类计划所有信息尽在手中，相关主题包括：世界遗产地、海洋、生物圈保护区、气候、地球、奴隶贸易、手工艺和“关于教科文组织”。《探索世界系列丛书》是适合青少年读者（10岁以上）的系列读物，有阿拉伯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版本可供选择。■

如欲订购此系列丛书或单册，请访问：www.unesco.org/publish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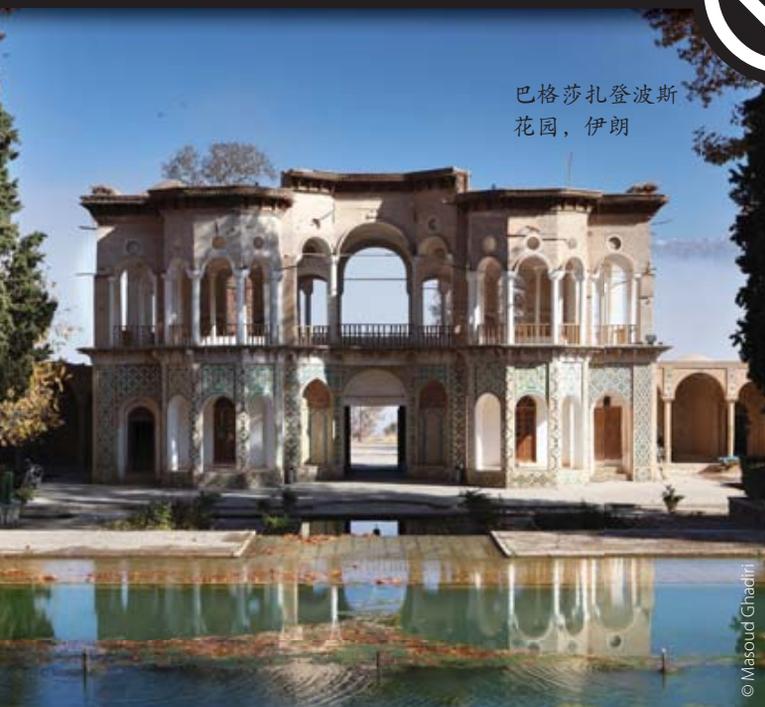
雷得罗湖史前湖岸
木桩建筑遗址，
意大利

© Romano Magrone / Trento Alto Adig



毛越寺佛教
净地花园，
日本

© Kawashima Printing Company



巴格莎扎登波斯
花园，伊朗

© Masoud Ghadiri



那库鲁湖火烈鸟，
肯尼亚

© UNESCO

人类遗产

2011年6月，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新增25个项目，遗产总数达936个。简要概述：

阿尔卑斯山周围的史前湖岸木桩建筑（瑞士、奥地利、法国、德国、意大利、斯洛文尼亚）

平泉--象征佛教净地的庙宇、园林与考古遗址（日本）

波斯花园（伊朗）

东非大裂谷的湖泊系统（肯尼亚）

宁格罗海岸（澳大利亚）



宁格罗珊瑚礁，
澳大利亚

© Tourism WA